

## 想像民族恥辱：近代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的 「東亞病夫」

楊瑞松\*

本文以追本溯源的方式，從釐清「東亞病夫」在不同的歷史脈絡中的不同意義，進而探討它在近代中國民族想像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我們可以確認十九世紀末期的甲午戰爭，促成了「東方病夫」說在西方輿論界誕生。由於目睹當時清中國改革無效，內部問題重重，某些西方觀察家以西方慣用形容類似局面的鄂圖曼帝國(土耳其)的形容詞——病夫(Sick Man)，來形容表達他們所觀察的清中國當時的困境。當時中國輿論界，尤其是致力於變法維新者以「逆耳忠言」態度正面看待這項源自西方的清中國「體檢報告」，中國思想家也引用相同的比喻，來強調當時中國必須變革的迫切性和正當性。可是到了二十世紀初期，國民改造成為政治社會改革根本的新思潮，尤其是強國必先強種的思維，使得國民身體素質的檢討批評成為新的思想課題。在這樣新的思想脈絡下，「病夫」的意涵在中國的思想文化界內，被中國思想家如梁啟超等操弄轉化成是針對當時中國人病弱身軀的寫實形容，甚至成為中國作家的自我比喻；但是在另一方面，隨著民族主義意識的高漲，「病夫」

---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本文初稿承蒙東海大學社會系黃金麟教授提供寶貴意見，此外幾位匿名評審也從不同研究視角和取徑，提出不少建設性的指正和建議，僅在此一併致謝。

論的「外來性質」也開始被強調。由於這些新的歷史因素影響下，「東亞病夫」產生的原始歷史背景和其單純意義，漸漸為人所遺忘。在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滋養哺育下，「東亞病夫」成為了百年來，中國人集體記憶中，代表著傲慢無情的西方人所一直掛在嘴邊，嘲笑中國和中國人的羞辱名詞。簡言之，這一在中國思想文化史上「成長轉化」的「病夫」，不啻是中國人所創造想像的「他者的詛咒」，轉而為中國人集體認同意識中的「原罪」，必須以身體技能所搏得的榮耀，尤其是現代國際體育競技場上，不斷地證明其已被解咒，已被清洗。從理性思想分析的角度而言，「東亞病夫」在近代中國「生根、成長、轉化」的過程中，充斥著太多認知上的謬誤和不必要的情緒操弄；但也正因為如此，它百年來的歷史動向不啻是近代中國人，在自我言詮和認識世界的過程中，對於西方和西方人愛憎交雜的矛盾心情的具體呈現的一頁滄桑史。

關鍵詞：東亞病夫、民族恥辱、集體認同、梁啟超、身體、東方主義

It is noteworthy that in seeking to incite passion Chinese political leaders have not turned spontaneously to charismatic appeals and themes of heroic glory that characterize the nationalism of most transitional societies. *Instead, to a large degree they have sought to detail the real and imagined ways in which China has been humiliated by others.* [ emphasis mine ]<sup>1</sup>

Lucian W. Pye

## 一、導論：問題的緣起

知名的美國中國史研究學者Paul A. Cohen 在檢討美國史學界研究中國

---

<sup>1</sup> Lucian W. Pye, *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71.

近代史時，認為西方學者應深自反省長期以來，西方學者以西方觀點和西方歷史發展為主軸的研究取向所造成的若干盲點；他呼籲其同僚應留心西方本位主義所可能產生的謬誤：包括錯認在中國近代史上，和西方無關或較少關連的歷史事物，即為不重要的研究課題的想法；或是有意和無意間，在各項研究議題上過度渲染誇大了西方的角色和影響力。他認為具有反省進步性的新研究取向，應以開放的眼界正視研究中國近代史的發展，並重新評估西方在此歷史中所真正扮演的適切角色，如此才有可能如他所期許“*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sup>2</sup>有趣的是，在這一部主要是針對西方中國史研究學界所作的自我反省檢之作品中，Cohen也提出一項值得注意的觀察，亦即西方學者之所以難以跳脫西方本位的研究取向，其中一項重要因素是近代中國學者也大量接受西方的觀點和分析架構來看待中國史，同樣地相當強調西方在中國近代史的關鍵角色。因此，對於西方的中國史學者而言，所謂局內者觀點 (*insider perspectives*) 是非常有限而不足以構成比較質疑之效。<sup>3</sup>

到底西方在中國近代史上扮演了什麼份量的角色？只要稍具歷史知識的人，大概都不會質疑其重要性。作為一西方專業史學家，Cohen這種自我反省的思維，並企圖降低西方在中國近代史的舞台上長期以來搶盡風頭的努力，除了可以說是反映了西方學界在晚近對於異文化研究的自我批判的風潮外，<sup>4</sup>他所寄望釐清的主要目標，是較適切地評量西方在近代中國的角色地位

---

<sup>2</sup> 值得注意的是，Cohen並沒有幻想種族中心的偏見扭曲 (*ethnocentric distortion*) 可以完全去除，他很謹慎地期待透過深切的反省檢討能夠大幅降低其負面效應。他指出其目標為 “The great challenge for Western historians is not the impossible one of eliminating all ethnocentric distortion; it is the possible one of reducing such distortion to a minimum and in the process freeing ourselves to see Chinese history in new, less Western-centered ways.” 詳細討論見 Paul A.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1-7. 引文見 p.1.

<sup>3</sup> Paul A.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p.1.

<sup>4</sup> 這股風潮的代表人物之一的 Edward Said，長期批判西方對非西方文化的詮解為充滿自我中心的霸權意識所扭曲，是一種化約式的本質論述 (*essentialism*) 產物，真正的目的不是了解尊重對方文化的豐富內涵，而是以簡化的二元對立模式來強化自我文化原先的成見進而宰制對方，詳細論述見其 *Orientalism* (London: Vintage Books, 1994).

和真正的影響力。然而，中國的學界和文化界是否也願意基於類似的反省精神，重新適切地釐清中國近代史上西方所扮演的角色呢？尤其是在某些歷史議題上，當西方的歷史角色，由於長期以來的政治操弄、文化宣傳、或是以訛傳訛的結果，已經被認定是窮兇極惡的加害者角色時，Cohen所期待的重新檢視西方確切角色的呼籲，能夠在中國思想文化界引起共鳴嗎？更明確地說，當西方是被安排且設定成近代中國史中重要的負面歷史角色，是在充滿情緒因素的民族集體記憶中，和其他早已深入人心的歷史解釋、環環相扣，成爲建構民族集體認同(collective identity)的根本依據之不可或缺的要角時，「西方真正的歷史角色」的重估，已經不再是單純的歷史研究討論課題了。Cohen所主張的理性反省，重估西方的新取向，恐怕得面臨不單是來自學術界的種種挑戰了。

本文之所以提出上述質疑作爲本研究的關懷起點，主要是因爲在我探討近代中國身體文化論述的過程中，所引發出的問題意識。身體，尤其是以每個國民血肉之軀爲關注研究對象的身體，無疑是近代中國改革的一重要環節。不論是在體育教育、生活規訓、公共衛生等面象上，從晚清以降，身體的改造莫不成爲改革的主要課題。<sup>5</sup>當我在閱讀百年來相關的歷史文獻資料時，尤其是有關身體改造的論述主張時，經常會讀到非常情緒化的字眼，其中最爲人所熟悉的莫過於所謂「東方病夫」或「東亞病夫」一詞的反覆出現。在經過一番仔細地中西文獻交互對比查證的過程後，我發現百年來中西之間有關「東亞病夫」的理解和論述，存在著嚴重的認知落差。更重要的是，就思想文化史的研究角度而言，從「東亞病夫」一詞在近代中國的公共論述中的意涵的演變，我們可以看到西方如何在近代中國民族建構想像的過程中，扮演著西方本身都沒有預期和意識到舉足輕重的角色。

長期以來不論是在政治宣傳、公共論述、或是大眾文化傳播上，在有關

---

<sup>5</sup> 相關代表作品參閱黃金麟，《歷史、身體、國家》(台北：聯經，2000)；許義雄等著，《中國近代體育思想》(台北：啟英文化公司，1996)。Susan Brownell, *Training the Body for China: Sports in the Moral Ord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身體文化的議題上，「東亞病夫」在廣大的全球華人文化圈內，可謂是耳熟能詳的字眼。1970年代時，李小龍在「精武門」電影中，以剛猛的體態、凌厲的身手，摧毀「東亞病夫」的匾額一景，可謂將洗刷「東亞病夫」民族恥辱的意識發揮到極致。這種從身體而衍生出的集體恥辱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視之為一種心靈集體創傷，深深烙印在近代海內外華人的心中。鄧小平在1987年時論及如何以中國歷史教育青年的談話中，就言及「中國從鴉片戰爭起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人成了世界著名的『東亞病夫』。」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博士在1986年接受訪談時，也明言「中國人歷來東亞病夫的形象等等問題，對我幼小的心靈也帶來極大的震撼」，「我從此了解到人當勤奮努力，才能改善國家貧窮落後的現狀；同時，也體認到要把中國從東亞病夫變成數一數二的世界強國，也是十分有可能的。」<sup>6</sup>

從上述兩段引文，我們可以看出「東亞病夫」被視為是針對中國和中國人，具有雙重指涉對象的負面形容詞。近年所出版的介紹百年來中國體育發展史的一本著作，更是直接以「東亞病夫」為斗大標題(《從“東亞病夫”到體育強國》)，以圖文並茂的內容，描述近代中國人如何從受鴉片煙毒之害，淪為東亞病夫，逐步發展成即將舉辦奧運、實現夢想的強國。<sup>7</sup>此外，在迎接2008奧運的中國官方網頁上，也有專文〈從東亞病夫到競技大國〉以感性的手法，強調北京奧運乃是中國人百年來夢想的實踐。<sup>8</sup>除了這些正式的文獻資料外，各類型的中港台三地新聞報導評論，網頁意見交流，尤其是近年來和北京奧運有關的討論中，提到「東亞病夫」者，可謂汗牛充棟，不勝枚舉。<sup>9</sup>其

<sup>6</sup> 有關鄧小平的談話，見楊英英編，《鄧小平文選》(台北：地球出版社，1994)第3卷，頁225；李遠哲的訪談「我的成長歷程」，見〈<http://www.sinica.edu.tw/as/person/ytleee/37.html>〉(18 July, 2004)。

<sup>7</sup> 高翠編著，《從“東亞病夫”到體育強國》(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

<sup>8</sup> 文章詳細內容，見〈<http://www.beijing-2008.org/51/81/article211618151.shtml>〉(18 July, 2004)。

<sup>9</sup> 這一類的論述實在多如繁星，最常見的論點就是把「東亞病夫」視為長期以來加在中國人身上的帽子，例如以下所引的香港文匯報談論運動在中國的意義：「在中國，體育運動和民族的榮譽是那樣的密不可分，以至於一個金牌的獲得會令全體中國人為之振奮，一場足球的失利又會令全國為之沮喪。不要以此來推斷中國民族精神之脆弱。實在是「東亞病夫」的帽子在中國人頭上壓得太久太久，中國人去除侮辱的夙願積澱得太深太深。」文章全文，詳〈<http://www.hknews.com>〉。

中很多都以「雪恥」、「摘掉洋人強加在中國人的帽子」等情緒性字眼，認為北京奧運的舉辦和所預期中國代表隊的佳績，將會是洗刷百年來西方人加諸於中國和中國人身上的「東亞病夫」詆毀標誌的偉大歷史時刻。不論是在學術著作上，或是公共輿論上，「東亞病夫」實在是隨處可見，老少耳熟能詳之議題。無怪乎一位美國學者以「現代中國人的原罪」形容「東亞病夫」在近代中國人集體認同意識所佔有的地位。<sup>10</sup>

我們應當如何理解這些情緒字眼的歷史文化意義呢？從上面的討論看來，「東亞病夫」似乎是一非常負面的形象，然而以全體中國人身體為恥的「現代中國人的原罪」意識，似乎反而發揮了如同凝聚人心同仇敵愾的功用。<sup>11</sup>更重要的是，因為在近代中國有關這一集體負面特質的想像，包含著深厚的集體受害和受辱的情結，它不再僅僅是對近代中國人集體身體的負面描述，它也一再被強調是一來自西方而加諸中國和中國人的侮辱標籤；換言之，它往往不被認為是中國人自怨自艾的自我警語，而是中國人所認定的他者(the Other)(即西方人)對於西方人的他者(即中國人)的東方想像(並且是非常羞辱的惡質想像)。簡言之，它具有奇特且複雜的雙重性質——「東亞病夫」是屬於東方卻也是屬於西方。<sup>12</sup>

令人覺得弔詭的是，相較於中國學界和文化界如此「著迷」於「東亞病夫」的文化意義，當代西方學者在對於中國近代身體文化的討論時，對於所謂「東亞病夫」卻甚少著墨。在諸多有關中國近代史的著作中，鮮少論及此一名詞，在有關近代中國體育和身體文化的專著中也大都一語帶過。更重要

---

[//www.wenweipo.com/special/WWP-50/china50/part2u.htm](http://www.wenweipo.com/special/WWP-50/china50/part2u.htm) (18 July, 2004)。

<sup>10</sup> Larissa N. Heinrich, "The Pathological Body: Science, Race, Literary Realism in China 1770-1930" (Berkeley, California: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2002), p.2.

<sup>11</sup> 換言之，此種對想像的共同體之身體所生之集體恥感，成為如同人類學家Benedict Anderson所分析的現代民族形成過程中，佔有重要地位的一種型塑想像力量。詳細討論見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New York: Verso, 1991).

<sup>12</sup> Said指出，從對異文化的了解過程中，建構對立物和「他者」來區別和激勵自我的文化認同和成長，是一相當普遍的現象。值得注意的是，建構的過程是各方角力的動態過程，因此他者或自我的"identity"都不是一成不變的。見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pp.331-332.

的是，對於此名詞的歷史文化意涵的了解和上述情況有明顯的落差。比方說，Brownell在其有關近代中國體育文化的代表作中，解釋此一名詞是「中國人所認定相信由日本和西方加諸中國人的侮辱性字眼」、「在中國人心中佔有神話式的比重(mythic proportions)」。<sup>13</sup>另一位學者在有關近代中國男性氣質的研討中，更直言「東亞病夫」是近代中國人在無力招架西方的入侵的情況下，所造成的「自我認同」(self-identification)現象。<sup>14</sup>令西方學者們好奇和驚訝的是近代中國人對此「負面標籤」的高度“著迷”，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們均強調此名詞在近代中國的所具有的重要文化意涵，是中國人自己所賦與和認定的結果，究竟這個侮辱性說法是否源自西方，是否真的是中國人所遭受西方人惡意的詆毀，則並非他們關懷探究的重點。

為什麼中西雙方會有這樣不同的理解和詮釋重點的落差呢？難道是現代西方學者刻意淡化處理長期以來西方加諸中國人身體的惡意中傷嗎？難道長期以來在中國文化意識中被視為是奇恥大辱的「東亞病夫」標籤，只是中國人的自我認同想像，而不是西方人強加於上的「帽子」嗎？這些疑點讓我們體會到在本文開頭所提及在中國近代史研究上，Cohen 所提出的問題意識的重要性。在近代中國史的發展舞台上，西方的角色如何適切定位，顯然不僅應該是西方學者的自我反省的問題而已；同樣地，處於中華文化圈內的學者，是否也能重新審視、許多長期以來標舉西方在中國的重要影響力(不管是正面或負面)的歷史認知或甚至是想像呢？

爲了了解「東亞病夫」的確切的歷史文化意涵，以及它在近代中國民族想像建構過程中和中西文明相互理解的發展史上所具有的特殊意義，本文將歷史化(historicise)此一名詞意涵的發展過程：本文將探討所謂它的西方源頭

---

<sup>13</sup> Susan Brownell, *Training the Body for China: Sports in the Moral Ord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p.327, p.22. Brownell對「東亞病夫」的完整定義為----An insult that the Chinese believed was applied to them by Japan and the West; a goal of international sports successes was to disapprove it.

<sup>14</sup> Kam Louie, "Chinese, Japanese and Global Masculine Identities," in Kam Louie and Morris Low, eds., *Asia Masculinities: The Meaning and Practice of Manhood in China and Japan* (London: RoutledgeCurzon, 2003), p.9.

之謎，並進而分析此一文字符號在近代中國的文化論述中的意涵演變，以釐清它在近代中國民族想像中，在自我界定和「他者想像」上所發揮的作用。本文將指出時下對於所謂「東亞病夫」的理解，事實上是一曲折的歷史建構過程的結果。但因為這個歷史過程的遺忘，使得許多人，包括學者專家等解讀「東亞病夫」的意涵或是其歷史意義時，大都犯了 presentism 的謬誤，而以一种非歷史(ahistorical)的詮釋方式，將時下通行於中國的理解，輕率地「讀入」歷史，因而得出一單純直線發展但卻是謬誤的歷史解釋。「東亞病夫」成為近代中國人認定是西方人主要的「中國人想像」的結果，不僅簡化了中西文化了解過程的多面性和複雜，也阻礙和誤導了中國文化界了解外在的世界到底如何想像和詮釋中國文化和中國人的真正顯著面象。我們將會看到百年來對於這個符號的意涵的操弄，導致了太多的情緒衝動和不必要的謬誤認知。它所代表的真正意涵，無乃是近代中國人面對西方文化的挑戰的過程中，愛恨情結交雜的最佳寫照。

## 二、重回歷史的起點：「病夫」的誕生

### 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

九月十一日(10月17日)租界英文報紙轉載了英國倫敦《學校年報》專論，稱“夫中國——東方之病夫也”。此后，中國人常被西方人貶為“東亞病夫”<sup>15</sup>。

在現今中國官方上海市體育局的五百年體育大事記中，我們發現了上引有關於「東亞病夫」的歷史淵源的記載。這個官方網頁以重點選擇的方式，條列了起至西元 1514 年(明朝年間)到西元 1997 年間，和上海有關的傳統武術和近代體育技競活動記錄。有趣的是，這一條有關「東亞病夫」但卻沒有涉及任何體育活動的陳述，在和網頁上前後文中其他關於各類體育活動的記載相比較之下，似乎顯得有些格格不入。可是很顯然地，網頁的編者似乎很

<sup>15</sup> 見中國上海市體育局大事記網頁，〈<http://tyj.sh.gov.cn/dashiji.jsp>〉(18 July, 2004)。



有把握地預知，他的廣大讀者群早已熟悉在有關體育的論述中，閱讀到和「東亞病夫」相關的記載，而不會有突兀之感。在這樣的文化情境下，這個大事紀不過是很「自然」地，以不到兩行的文字敘述，向其讀者解釋他們所熟悉的「東亞病夫」在百年前的歷史源頭。

然而，這項由官方認可且傳播的「東亞病夫」之恥的歷史起點的說法，到底告訴了我們什麼訊息？從表面上看來，這項歷史起源論述提供了時間(西元 1896 年 10 月 17 日)、地點(由英國倫敦到上海)、和文獻源頭(倫敦某報到上海租界某英文報)和明確的引文，「夫中國——東方之病夫也」，和其歷史解釋，「此後，中國人常被西方人貶為『東亞病夫』」。值得注意的是，這簡短官方網頁的敘述有些省略，必須加以說明：原本的倫敦英文報紙文章，經上海《字林西報》轉載後，同年 11 月由《時務報》翻譯成中文刊載，其文章標題為〈中國實情〉。因此引述的文句，「夫中國——東方之病夫也」，是出自中文翻譯之作〈中國實情〉。<sup>16</sup>我們姑且不論上述這些省略有否疏失，令人好奇的是，這樣似乎有本有據的歷史敘述，是否已經簡單明瞭地解釋了百年之恥的開端和發展，對廣大的讀者說明交待了他們心中早已認定的「國恥的西方之源」呢？<sup>17</sup>

如果我們仔細地分析此項看似「言簡意賅」的「東亞病夫」源頭論，<sup>18</sup>這

<sup>16</sup> 《時務報》，第10冊，光緒22年10月1日，頁650-652。

<sup>17</sup> 上海市體育局的解釋，和其他對此相關課題探討的作品的論點，基本上是一致的。比方說，在熊曉正等人所著的期刊論文中，雖然指出嚴復在1895年3月所發表的《原強》，已經使用「病夫」形容當時中國的現況，但也認定「東方病夫」的說法確是源自1896年的倫敦報紙的專文。必須指出的是，熊曉正一文更進一步認為，此專文翻成中文刊載後，造成「一時間，『東方病夫』成為鞭笞麻木不仁的中國人的警語」。詳見熊曉正、曹守誅、林登轅，〈20世紀中國人體育認知的軌迹〉，《體育文史》，第1期(1997)，頁21-24。另外高翠所編著的前引書，《從“東亞病夫”到體育強國》亦持相同論點，見該書頁9。

<sup>18</sup> 以下的分析借鏡美國史學家Herman Ooms對所謂歷史源頭論述的一些反思。在Ooms分析日本德川政權和新儒家的政教關係的研究中，他指出許多史學家，因為輕率地接受所謂——「德川家康在1600年取得軍事勝利後，為了求得天下長治久安，採納新儒家的學說為其官方意識型態，此為新儒家為官方哲學的起點」——的歷史起源的典型傳統說法，使得他們從一開始就無法分析檢視此種歷史起源論說法的背後諸多應被檢證的預設，和其所反映的特定意識型態。Ooms因此提醒史學家應該仔細地質疑各種似乎是「客觀自然」之起源論的論述，從而釐清了

個解釋中，至少還有三種層次的脈絡(context)的分析是必須加以說明釐清的。(1)首先，「夫中國——東方之病夫也」這一段話的文本脈絡究竟為何？也就是說這篇英文專論的整體內容是什麼？(2)其次，這篇專論是在什麼樣歷史脈絡中產生？換言之，1896年的這篇專文論述是在什麼樣的歷史情境下產生？(3)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Sick Man(病夫)一詞在西方的公共論述脈絡中，尤其是有關國際政局的討論中，其確切指涉的意涵到底是什麼？

就第一個文本脈絡(textual context)的考察而言，令人驚訝的發現是，這篇以〈中國實情〉為題的評論文章，其實不過是一篇針砭當時清中國的改革失敗的政論。文章開頭之所以用「病夫」形容中國，是因中國「其麻木不仁久矣，然病根之深，自中日交戰後，地球各國始悉其虛實也」，除此較感性的導論外，文中評論內容並未再出現「病夫」的稱謂，主要是針對當時清朝官僚系統腐敗，官場積習太重，導致多項軍事政治建設改革失敗的情況，提出多項嚴苛的批評意見；可是雖然作者有嚴厲的批評，文末仍分析由於各國相持不下，中國尚有機會從事維新改革，因而期勉中國政府亡羊補牢——「總之，北京執政之臣，若果以除舊弊、布新猷為急務，勢雖岌岌，猶未晚也！」<sup>19</sup>值得注意的是，文中批評的對象完全是針對當時的中國政府，沒有隻字片語提及中國老百姓；文中所建議的政治改革事項，也無任何一項有關所謂國民體格體質的改造計劃。簡言之，文章的主旨很清楚：「中國」，這個國家之所以成為「病夫」，是其政府長期無能改革的結果。平心而論，如果就文末的忠告看來，此文尚不失為一來自英國輿論界的善意批評。

至於就第二個文本產生的歷史脈絡(historical context)而言，這篇文章的開頭所言中國「病根之深，自中日交戰後，地球各國始悉其虛實也」，提供了一條重要線索。也就是說，中國之所以會被西方視為「病夫」，實源於中國在中日甲午戰爭一敗塗地的表現，暴露了其多年來，自強改革的努力並沒

---

解潛藏在這一類論述的背後被有意或無意所遮掩的複雜歷史現象。有關Herman Ooms的對此課題的完整反思，參閱其*Tokugawa Ideolog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3-17.尤其是 p.6.

<sup>19</sup> 《時務報》，第10冊，光緒22年10月1日，頁652。

有真正改造其國力的根本弱點。先前西方列強雖明瞭中國國力已非西方的對手，然而中國出乎各方意料而居然大敗於後起之秀的日本之手，促成了西方輿情認為中國改革的內部問題是遠比先前的認知來得嚴重。事實上，《萬國公報》在1894年12月時，也就是早在中日甲午戰爭尚在進行之際，所轉載西方各國輿情對戰事的看法中，就有《法國時報》的一篇評論明言「今東方又有一病夫矣，日本雖小，竟將搖動其本根，摧傷其枝葉」<sup>20</sup>。此外，英國The Times(泰晤士報)記者Valentine Chirol，也針對中國政府在戰爭中和戰後改革的表現給與嚴厲批評，在其1896年所出版有關亞東事務的論文集集中，在分析論德、法、俄三強為何中日戰後干涉日本在中國的利益時，有如下的描述：

Their action was practically a notice served upon Japan that even though the **Sick Man of the Far East** were lying on his death-bed she was to have no share in his future inheritance. This notice she was obliged to accept, and under present conditions, she must for some time to come to acquiesce in its consequences. From the moment, therefore, that she finds herself excluded from all further participation in the spoils of the **Sick Man**, her interests are transferred from the side of those who aim more or less openly at the dismemberment of the Chinese Empire to that which makes for the maintenance of the *status quo*.<sup>21</sup>

從引文中，可以看出Chirol明確地以「Sick Man」躺在瀕臨死亡之床的困境，形容當時清中國在中日甲午戰後的國際形象。<sup>22</sup>

<sup>20</sup> 《萬國公報》，第71卷，1894年12月，頁14885。此外，在英國The Times的一篇題為“China and Japan”的分析報導中，其中所引述的法國Temps的一篇評論文章認為日本在馬關條約的主要目標為“Japan has obtained for herself a position so favourable as to be sure of being the first to appropriate the spoils and to receive the inheritance of the new ‘sick man’ of the Far East.” The Times, 23 April 1895, p.5.由此證據可以看出當時在英法兩國輿論界，都有出現以“sick man”的比喻來形容當時日暮西山的清中國。

<sup>21</sup> Valentine Chirol, *Far Eastern Question* (New York: Macmillan and Co., 1896), pp.150-151.

<sup>22</sup> 必須指出的是，根據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對於sick man一詞的解釋，OED, 1989 2<sup>nd</sup> ed., Vol

從這些例子中可以推斷出，中日甲午戰爭所產生的東亞國際新局勢，應是西方輿論界開始以「病夫」一詞，形容清中國這一東方的老大帝國的關鍵歷史因素。在《時務報》1896年的刊載的另一篇譯自西曆11月30日《字林西報》的〈天下四病人〉中，將中國、土耳其、波斯和摩洛哥王並列為當時天下四病人，在評論中國的國力之弱時，認為「昔中日之役，若無人干預，聽其自然，中國不為其所滅者幾希」。值得注意的是，該文認為中國雖弱，尚能維持自主之權，因為「民情凶悍，專恃殺戮謀反，所有三百兆之民人，各國均不願勞心而治之」<sup>23</sup>從文章的前後文對照可以很清楚的看出，「病人」一詞是用來形容當時中國國力之弱，和被形容為「凶悍殘暴而難治之眾」的中國人並無任何關係。必須清楚地指出的是，這樣的論述和長期以來華文世界所認知的「東亞病夫」的指涉意涵是不一致的。為什麼會如此呢？要對此現象作一通盤了解分析，我們必須先對「Sick Man」一詞在西方政治論述，尤其是近代西方國際關係的公共論述的脈絡中，所真正指涉的意涵有正確的認知。

對於通曉近代歐洲國際關係史者而言，「Sick Man」絕非是一陌生名詞。土耳其的前身，亦即鄂圖曼帝國(Ottoman Empire)，從十九世紀中葉起，就因為其國力衰敗，屢為西方列強所欺且欲振乏力，而相傳為其強鄰的俄皇尼古拉斯(Tsar Nicholas I)在1853年間譏為「Sick Man of Europe」，而此一形容詞也在西方廣為流傳。換言之，在西方公共論述以「Sick Man」形容十九世紀末時國力衰敗，積重難返的中國之前，土耳其因為其類似的處境，早已成為西方公共輿論中知名的「Sick Man」。這也正是為何前述轉載於《萬國公報》的《法國時報》的評論文章會以「今東方又有一病夫矣」行文，而《萬國公

---

XV, p.410, Chirol 是在西方公共論述中率先以「Sick Man」形容甲午戰後中國窘態的代表人物。身為泰晤士報(*The Times*)的記者。Chirol在中日甲午戰爭期間和戰後都有對當時中國的情形報導和評論，在其前引書中*Far Eastern Question*的前言中，他也言明書中內容使用了很多他先前發表於泰晤士報(*The Times*)關於遠東政局的看法；文章內容中，也有記載他本人親自在中國天津和李鴻章會談的經過。

<sup>23</sup> 《時務報》，第14冊，光緒22年11月11日，頁918-919。

報》的編者也特別在其中加註說明歐洲各國已視土耳其為一病人的歷史背景。<sup>24</sup>事實上，在近代西方公共論述中，以「Sick Man」形容一個國家國力衰敗且欲振乏力的困境，並不限於指稱土耳其和中國。除了前引〈天下四病人〉的例子外，在1860年間，美國國會議員Cox也以「Sick Man」形容當時的墨西哥<sup>25</sup>；不僅如此，近年來，包括英國、義大利、德國、奧地利、俄國、日本等，都因為其國力衰退且改革無力，被西方新聞媒體以斗大的新聞標題——「Sick Man」來形容其困境。<sup>26</sup>

從以上的綜合分析可以看出，在十九世紀末期，由於中日甲午戰爭的影響，西方輿論界才開始將其早以習以為常的政治術語——「病夫」（形容一個國家長期衰敗又無力改革的窘態），應用到討論中國政治情況的論述。<sup>27</sup>而這一新現象也經由此時期的中國翻譯出版新聞事業的媒介，傳播到當時的中國思想文化界。

從西方的文獻資料中，我們看不出這一名詞有任何指涉中國人民，尤其是有關中國人民體質或日後所謂體育的相關課題的情形；此外，從當時《時

<sup>24</sup> 《萬國公報》，第71卷，1894年12月，頁14885。

<sup>25</sup> 有關「Sick Man」一詞在近代歐洲的政治論述時的使用例證，參見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對於sick man的解釋。

<sup>26</sup> 可以從以下的網頁了解此現象：用來形容德國如“**Germany: The Sick Man of Europe?**”〈[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ies/commentary\\_text.php4?id=83&lang=1&m=contributor](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ies/commentary_text.php4?id=83&lang=1&m=contributor)〉(18 July, 2004)；形容日本如的“**Asia's Sick Man Jumps Out of Bed**”〈<http://www.iht.com/articles/517763.html>〉(18 July, 2004)；形容英國的如“**Is Britain Europe's New Sick Man?**”〈[http://www.businessweek.com/magazine/content/02\\_50/b3812068.htm](http://www.businessweek.com/magazine/content/02_50/b3812068.htm)〉(18 July, 2004)；形容義大利如“**The New Sick Man of Europe**”〈<http://observer.guardian.co.uk/comment/story/0,6903,1113142,00.html>〉(18 July, 2004)；形容俄國的如“**The Sick Man of Asia: Russia's Endangered Far East**”〈[http://www.findarticles.com/p/articles/mi\\_m2751/is\\_73/ai\\_109220705](http://www.findarticles.com/p/articles/mi_m2751/is_73/ai_109220705)〉(18 July, 2004)；甚至在Wall Street Journal上還有形容全歐洲的用法：“**All of Europe Is the Sick Man Now**”〈<http://www.freedomandprosperity.org/Articles/wsj10-14-02/wsj10-14-02.shtml>〉(18 July, 2004)

<sup>27</sup> 必須指出的是，從現有的英文相關資料看來，即使在文章中運用此一特定名詞（「Sick Man」）來形容當時的中國，也都是以一語帶過，並沒有以斗大的標題作聳動式的宣傳。如前引Chiról書中，在將近兩百頁的評論文章中，除了上述引文之外，也只有在另外一段話（“By her intervention Russia Openly proclaimed her determination to assume henceforth the guardianship of the Chinese Empire until such time as by the laws of nature, assisted or unassisted, the sick man of the Far East should pass away and his inheritance be formally appropriated.” p.66.）以「Sick Man」形容中國，在其他論述中都還是以「China」行文。

務報》或《萬國公報》所翻譯有關「Sick Man」(病夫或是病人)的翻譯文章看來，其中的文義都單純地指對清中國政府的批評，也未將「病夫」和當時中國老百姓作任何關連，翻譯的文章反映了西方輿情對於當時中國國力衰敗和清政府無能改革的看法。奇怪的是，那為什麼會有如現今上海市體育局網頁所描述的「此後，中國人常被西方人貶為『東亞病夫』」的現象呢？或是出現目前大家耳熟能詳地，「要以國際體育競技獎牌，來洗刷外國人強加在中國人身上『東亞病夫』的恥辱標籤」的公共論述呢？必須指出的是，在外文的譯文中，都沒有使用目前大家耳熟能詳的「東亞病夫」字眼？嚴格而言，頂多只有「東方病夫」的說法，那麼，從西方產生的「病夫」說，是在什麼樣的歷史演變發展下，成為今日的風貌呢？更重要的問題是：促成其演變的是那些因素呢？而這些因素是源自西方或是來自中國呢？如果是來自中國，那麼我們又要如何重估所謂「東亞病夫」所代表的來自「西方的羞辱」呢？

### 三、在中國「成長變化」的「病夫」：從「中國是東方病夫」到「中國是東方病夫之國」

#### (一)落地生根的「病夫」

除上文所分析的三個脈絡的釐清，有助於我們了解「病夫」在一百年前，在西方和在中國公共論述中的明確意涵外，針對本文所欲探討的主題，事實上還有另外一個歷史脈絡的釐清，也是相當重要地：當時清中國的思想文化界是如何看待這一來自西方的「病夫」論，中國的「病夫」形象引起什麼樣的迴響呢？

誠如多位學者所指出，甲午戰爭對於當時中國思想文化界的影響，遠遠大於先前各次清軍敗於西方列強的諸次戰役。大清帝國居然也慘敗於其長期所鄙視的日本的事實，令當時許多關心國是的知識份子，充滿沮喪、憤怒、

反省等複雜心情。<sup>28</sup>在這樣危機意識高漲、反省求變的思想氣氛下，加速了當時對西學了解的渴求，不少新型報紙出現，大力鼓吹西學的散播。在 1896 年發行，由梁啟超所大力主導的《時務報》正是其中之佼佼者。<sup>29</sup>梁啟超在其〈論報館有益於國事〉一文中，直陳辦報應「廣譯五洲近事，則閱者知全地大局，與其強盛弱亡之故，而不至夜郎自大，胥并以議天地矣。」<sup>30</sup>這種廣譯外文以俾中國知識界了解外界世界脈動的想法，在具體的實踐上，可從《時務報》刊登大量的外國評論譯文的作法得到印證。如是觀之，不論是翻譯刊載以「夫中國——東方之病夫也」為破題的〈中國實情〉一文，或是〈天下四病人〉一文，《時務報》均是以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的用心，期勉中國的讀者能了解外國的觀察家對中國的改革的看法和意見，而非刻意報導外人如何惡意羞辱中國和/或中國人。

更值得注意的是，連當時力勸中國政府變法圖強的外國在華傳教士之一的李佳白(Gibert Reid)，更早在《時務報》的〈中國實情〉刊出之數月前，於《萬國公報》上發表〈探本窮源論〉一文中，就以「中國之情形，譬如一大病人」為導言，認為「為今之計，莫先延醫揀方；將病之內源外流，一一痛除之，使無少留根株，然後培其元氣」。他並且分別以「論弊病之情形」、「論弊病之源流」、「論除弊病之外感」、「論除弊病之根」為主題，論述他對於當時清政府如何對吏政、財政、教育等各方面的意見。有趣的是，他在論中國的病況時，特別以「安慰」式的語氣說「非獨中國有病，西國無病也，特輕重分焉耳」，並列出以病情嚴重性(十等分)區分而言，土耳其介於七和八之間、俄羅斯為五六之間、英國則為一二之間等。簡言之，其文的要旨在於闡

<sup>28</sup> 有關甲午戰爭對當時思想界的衝擊坊間論述甚多，可參閱湯志鈞，《戊戌變法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頁1-347；葛兆光，〈1895年的中國：思想史上的象徵意義〉，收入於氏著，《中國思想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第2卷，頁530-550；張灝，〈晚清思想發展試論——幾個基本論點的提出與檢討〉，收入於周陽山、楊肅獻編，《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晚清思想》(台北：時報，1982)，頁19-33。

<sup>29</sup> 見張灝，〈晚清思想發展試論——幾個基本論點的提出與檢討〉，收入於周陽山、楊肅獻編，《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晚清思想》，頁29。

<sup>30</sup> 梁啟超，〈論報館有益於國事〉，收入於《飲冰室文集》(上海：中華書局，1941)第1冊，頁102。

明成爲病人並非是一奇恥大辱且無可救藥之事，重點在於應該面對病況、了解病源所在，進而對症下藥，如此中國才能「翻然醒悟，力自振拔。中國幸甚，天下幸甚」。<sup>31</sup>

由此可見，當時以「病夫」形容當時中國的處境，並進而提出改革之道的論述，有出自西方輿論界，也有出自於身於中國有第一手觀察經驗的西方人士。不僅如此，包括嚴復，康有爲、和梁啓超等中國知識份子，也都在他們自己論述中國改革之道的文章中，以「病夫」形容中國的困境。嚴復在其著名的〈原強〉(發表於西元 1895 年 3 月)以「蓋一國之事，同於人身。今夫人身，逸則弱，勞則強者，固常理也。然使病夫焉日從事於超距羸越之間，以是求強，則有速其死而矣。今之中國，非猶是病夫也耶。」<sup>32</sup>嚴復在此以當時的中國爲病人的比喻，說明改革若沒有從根本(其所主張的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三事)作起，則變法求強只會讓病人(中國)速死。必須指出的是，嚴復在此文中雖痛陳鴉片和纏足二事嚴重損害他所注重的人民手足體力之培養，他並沒有以「病夫」來形容當時的中國人的體質方面的情況。

很可以預見的，梁啓超身爲《時務報》的主筆，同時又和嚴復和李佳白等鼓吹變法革新人士也有私交和知識上的溝通往來，梁對於當時中西輿論界以「病夫」比喻中國的現況的現象當然不陌生。<sup>33</sup>在他西元 1897 年論變法的文章中，他大力駁斥當時認爲中國改革應仿西方以「練兵」爲要務的看法，他認爲中國應從根本之改革(興學校、改官制、獎農事、拓商務等)作起，因爲「彼西人之練兵也，其猶壯士之披甲冑而執戈鋌也。若今日之中國，則病夫也，不務治病，而務壯士之所行。故吾曰，亡天下者，必此言(中國應首重

<sup>31</sup> 李佳白，〈探本窮源論〉，《萬國公報》，第89卷，1896年6月，頁16075-16084。

<sup>32</sup> 嚴復，〈原強〉，收於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中國哲學史組編，《中國哲學史資料選輯——近代之部下》(北京：中華書局，1962)，頁369。

<sup>33</sup> 梁啓超在1897年曾應為李佳白之請，為李所創之「尚賢堂」為文紀念。文中談及他和李佳白以前在強學會中相識。見梁啓超，〈記尚賢堂〉，《梁啓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第1冊，頁112。康有為和梁啓超深受當時在華傳教士引進西學的影響，尤其是廣學會的成員如李提摩太等引進之西學，詳細討論見王樹槐，《外人與戊戌變法》(台北：中研院近史所集刊，1980)，頁99-112。



練兵)也」。<sup>34</sup>他和上引的嚴復持類似的意見，認為以當時中國為「病夫」的情況下，改革必須務本而不能強求速達。此外，在梁啟超 1898 年發表之「俄土戰紀敘」的文章開頭更明言：

西歐人恆言曰「**東方有病夫之國二，中國與土耳其是也**」。土耳其所以削弱，其故有二。一曰：「內治不修，綱紀廢弛，官吏貪黷，魚肉其民，因循成法，莫肯少更，束縛馳驟，激成民變；二曰：外交不慎，妄自尊大，不守公法，屢起教案，授人口實，取怨各國，合而謀之。嗚乎，其與今日中國之情實，何相類也！」<sup>35</sup>

從這一段話我可以清楚看出，梁啟超不僅很平實地引用了西方輿論對當時中國為「病夫」的說法，並且很巧妙地以分析土耳其為何削弱(因而是病夫)的「病因」，間接點出他對當時中國為何也成為是「病夫」的內政外交因素(嗚乎，其與今日中國之情實，何相類也!)。和先前所分析其他文章一樣，在這些「病因」中，梁的批評對象都是政府的過失，他並未提及有關來自人民的因素，更沒有所謂國民體質的問題，這和他日後的想法並不相同，這一差異點將會在下文的比較分析中更進一步的探討。

從以上這些例子，我們可以看出，將中國視為「病夫」的說法，在十九世紀末期，尤其是甲午戰後的中國思想文化界，不僅沒有被理解為西方人惡意中傷，羞辱中國的作法，它更是被中國境內的鼓吹變法的論述所引用，成為救亡圖存的一項利器。康有為在其 1898 年 6 月上奏給光緒帝的〈進呈突厥削弱記序〉結論直言：

《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道，罔不亡。」**中國與突厥(土耳其)乎，西歐久謂東方兩病夫矣，其意謂未知孰為先死也**。今中國之形與突厥同，中國之病，亦與突厥同。臣編譯突厥事，竊竊自危，傍徨淚下，竊幸恭逢我皇上神聖英武，維新變法，且決立憲，有以起病而扶衰焉，惟此獨與突厥異。中國不亡，國民不奴，惟皇上是恃。《書》：

<sup>34</sup> 梁啟超，〈論變法不知本原之害〉，《飲冰室文集》，第1冊，頁11。

<sup>35</sup> 梁啟超，〈俄土戰紀敘〉，《飲冰室文集》，第3冊，頁33。

「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中國四萬萬人民之幸也。臣謹編譯，上呈聖鑒，臣康有為序言。<sup>36</sup>

康有為這一段話有幾點值得注意：「病夫」之謂已不是單純形容國家無能改革、積重難返的敗象，更是「死亡」（國家滅亡）的預言；換言之，「病夫」若不力行革新，不只是會再度面臨敗戰，而是會有亡國之虞。其次，康有為和梁啟超同樣地承認，中國和土耳其是「同病相憐」局面；在此認知前提下，康有為以「有以起病而扶衰焉」來激勵皇帝，稱讚光緒皇帝致力於改革變法的決心。

從以上的分析，我們大致上可以看出，從力促改革變法的論述角度而言，「病夫」之謂在甲午戰後，危機意識高漲的中國思想文化界，成為激發人心深思反省的逆耳忠言。<sup>37</sup>它不僅生動地形容清中國的弊病重生，積習難改的困境，更成為鼓吹變法者口中，中國若不進行根本的變革，必將遭亡國的垂死之際的最佳寫照。所以面對這種基本上源自於西方的中國為「病夫」說法，十九世紀末的中國思想文化圈，基本上是抱持深切自我反省檢討的態度，甚至援引其說以強化改革的決心。也就是說，在當時不僅沒有所謂「東亞病夫」是外國人恥笑中國人，尤其是針對中國人的身體，所「強加在中國人身上的帽子」的想法，更沒有要以體育競技表現來洗刷「東亞病夫」的民族恥辱的論述。為了了解日後，「病夫」說在中國思想界文化界的戲劇式的轉化，為何它成為中國人集體受辱情結的歷史發展，我們必須進一步分析維新變法失敗後的近代中國思想發展的一些重要趨勢。

<sup>36</sup> 康有為，〈進呈突厥削弱記序〉，收入於湯志鈞編，《康有為政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上冊，頁300。

<sup>37</sup> 在1901年《清議報》上一篇〈論議和後之中國〉的評論文章，很明確地以西方列強視土耳其為「病夫」，列強合謀而玩弄於掌上。作者警告「今東西病夫，既受彼六國之軛縛，固無能脫其彼掌握矣。移其術以處我秦東病夫。亦將用其故技。」由此觀之，當時輿論對於「病夫」的政治譬喻的確切了解，應已相當普遍。文章詳《清議報》，70冊，光緒27年，頁4481-4486。

## (二)轉化變形的「病夫」

中日甲午戰爭後的中國思想文化界，除了上述的變法圖強的危機意識外，另一項影響深遠的變化莫過於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崛起。嚴復所引介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中所傳遞的新「真理」——國與國之間的生死存亡競爭，事實上是種和種之間的生存鬥爭——成爲當時救亡圖存思維的根本信念。嚴氏認爲達爾文學說的一大重點爲：「民民物物，各爭有以自存。其始也，種與種爭，及其成群成國，則群與群爭，國與國爭。而弱者當爲強肉，患者當爲智役焉。迨夫有以自存而克遺種也，必強忍魁桀，躑捷巧慧，與一時之天時地利泊一切事勢之最相宜者也。」換言之，國和國之間的競爭不再是各國的領導人或政府之間的鬥爭，它是組成各國的所有人民之間的總體戰爭；國力的強弱不單取決於政府的領導和政策，更重要是，國家富強之本在於其人民的素質——強國必先強種。這也正是嚴復認爲當時清中國改革的根本之道在於「鼓民力、開民德、興民智」。<sup>38</sup>

這種把族力等同於國力的觀點，和政治改革需要從人的改造做起的新見解，可以說是十九世紀末中國想界有關政改的一重大轉變，而清廷變法失敗更促成這一種信念的深化。論者大都以梁啓超在二十世紀初所發表之「新民說」爲此新思維的代表作，但若仔細閱讀梁氏在先前(光緒 26 年、1900 年)所著之《中國積弱溯源論》，其中正是以改革必先從國民改革做起爲核心論述。梁氏不僅用相當大的篇幅形容中國的情況，就如同「一久病之人卻不自知，而中國之會有病「蓋政府與人民各皆有罪焉」。梁氏認爲官吏雖難逃殃國誤民的罪名，但是「官吏由民間而生，猶果實從根幹而出，樹之甘者其果恆甘，樹之苦者其果恆苦」，在此種追本溯源的思維邏輯下，梁氏痛陳千百年來，中國人的集體弊病——以奴隸自居的奴性、愚昧、但知有小我之私不知有大我之群、虛偽、怯懦、無動。除此之外，國人不知國家與天下之差別、不知國家與朝廷之界限、不知國家與國民之關係等「三不知」亦爲中國國民

<sup>38</sup> 嚴復詳細的論點見氏著，〈原強〉，收入於《中國哲學史資料選輯》，頁357-377。

造成中國病弱之主因，在這一篇可謂是世紀初中國的「身心體檢報告書」中，梁氏以極為沉痛的語氣，細數中國的「病源」並直言「中國自康熙以後，日腐月敗，馴至今日為世界第一病國。」<sup>39</sup>

梁氏在此文中雖然用「病國」一詞取代「病夫」來稱謂當時的清中國，但是文中所條列的多項「病源」的診斷，清楚地表達了他對於甲午戰後中國國力未見改善的關懷迫切之心。值得注意的是，在抨擊國人怯懦、好柔弱且乏尚武之精神時，梁氏並未就中國人的體格體力方面多所著墨，在此他所注重的還是國民的思維態度和價值觀的取向。就這一點而言，梁氏在其著名的《新民說》上，有進一步的論述，而其改變也和本文的主題有密切關連，因此我們必須細究梁氏在《新民說》中，在有關體格體力上有那些新論點。

《新民說》中的〈論尚武〉一文發表於1903年，梁氏在此文中除了接續其先前批評中國民族長期尚文弱、缺乏尚武精神的論點外，更強調應以西方古代斯巴達的軍國民教育，從小培養國民剽悍勇猛之體魄。<sup>40</sup>文中多次論及「病夫」：

**我以病夫聞於世界，手足癱瘓，以盡失防護之機能，東西諸國，莫不磨刀霍霍，內向魚肉我矣，我不速拔文弱之惡根，一雪不武之積恥，二十世紀競爭之場，寧復有支那人種立足之地哉！**<sup>41</sup>

在此處，梁氏「所謂我以病夫聞於世界」其中的「我」的意涵，就前後文的脈絡看來，應當還是指當時積弱不振的清中國。可是在另一段話，「病夫」有了不同的涵意：「二千年之腐氣敗習，深入於國民之腦，遂使群國之人，奄奄如病夫，冉冉如弱女，溫溫如菩薩，戢戢如馴羊。」<sup>42</sup>在此，梁氏很明

<sup>39</sup> 見梁氏詳細論點於氏著，〈中國積弱溯源論〉，《飲冰室文集之五》，頁12-42。

<sup>40</sup> 梁氏有關軍國民教育的想法，無疑反映出當時已由蔡鍔和蔣百里所大力鼓吹之「軍國民運動」的「全民皆兵」主張。有關此運動思想文化的分析，見黃金麟，《歷史、身體、國家》，頁55-69。關於軍國民教育和體育的關連，參閱許義雄，〈軍國民教育之體育思想(1880-1918)〉，收入許義雄等著，《中國近代體育思想》，頁37-121。

<sup>41</sup> 梁啟超，〈新民說〉，收入夏曉虹編，《梁啟超文選》（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頁160。

<sup>42</sup> 梁啟超，〈新民說〉，收入夏曉虹編，《梁啟超文選》，頁157。

確地以「病夫」形容所有的國人，而這樣的形容，梁氏更進一步說明其為中國「病源」：

中(國)人不講衛生，婚期太早，以是傳種，種已孱弱，及其就傅之後，終日伏案，閉置一室，絕無運動，耗目力而昏眊，未黃耆而駘背；且復習為嬌惰，絕無自營自活之風，衣食舉動，一切需人；以文弱為美稱，以羸怯為嬌貴，翩翩年少，弱不禁風，名曰丈夫，弱于少女，弱冠而後，則又纏綿床第以耗其精力，吸食鴉片以戕其身體，鬼躁鬼幽，蹠步軟跌，血不華色，面有死容，病體奄奄，氣息才屬：合四萬萬人，而不能得一完備之體格。**嗚呼！其人皆為病夫，其國安得不為病國也！**以此而出與獐猛梟鷲之異族遇，是猶驅侏儒以鬥巨無霸，彼雖不持一械，一揮手而我已傾跌矣。嗚呼！生存競爭，優勝劣敗，吾望我同胞練其筋骨，習于勇力，無奄然頹憊以坐廢也！<sup>43</sup>

梁氏此處的論點不但明言，社會達爾文主義主導的優勝劣敗之生存法則的國際競爭，為中國無可逃脫的現實局面；更重要的是，在強國必先強種的前提下，梁氏較其先前的論述更明確地指出：群國之人(四萬萬人)皆為「病夫」的局面是中國成為病國之因。在此，梁氏可謂「創造轉化」了原先「病夫」一詞在甲午戰後用來形容中國國力衰敗、無力改革的意涵。病夫不僅用來指涉中國，同時更轉化意涵，用來形容梁氏眼中，當下所見盡是「血不華色，面有死容，病體奄奄，氣息才屬」的四萬萬同胞。我們雖然無法百分之百斷言，梁氏是首先將「病夫」一詞作此項重要轉變的第一人，但證諸《新民說》之前，包含梁氏本人和其他人的政論思想中言及「病夫」的論述，梁氏在二十世紀初對「病夫」的解釋，明顯地出現和過往不同意義。<sup>44</sup>

<sup>43</sup> 梁啟超，〈新民說〉，收入夏曉虹編，《梁啟超文選》，頁163。

<sup>44</sup> 值得注意的是，在張之洞發表於1897年有關戒纏足運動的文章中，張氏有以下之論：「今以洋藥弱之於既生以後，而又以母氣不足弱之未生以前，數十百年以後，吾華之民，幾何不馴致人人為病夫，家家為侏儒，盡受殊方異族之蹂躪魚肉而不能與校也。」見苑書義、孫華峰、李秉新主編，《張之洞全集》(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頁10061。雖然張氏在此論述中有「人人為病夫」的說法和梁氏上引之文雷同，但是張氏所意味者乃是「數十百年以後，吾華之民」的可能局面，並非指當時他所面臨的情況，而且「人人為病夫」之說在張氏全文中只是一語帶過，

在當時盛行的保國保種的危機意識和民族主義思潮下，梁氏這種將個人擴充而成的群體之命運和國家命運密切關連的論述是相當普遍。相較於梁氏「四萬萬同胞皆為病夫」的無情批判，他在1904年發表之〈新大陸游記〉一文中，更以強烈對比的方式，凸顯他所觀察到的美國人種的健康強壯特質。他認為「中國人性質不及西人者多端」，他條列出很多「我族」和「他族」在生活作息和身體特質上的差異：

試集百數十以上之華人于一會場，雖極肅穆毋嘩，而必有四種聲音：最多者為咳嗽聲，為欠伸聲，次為嚏聲，次為拭鼻涕聲。吾嘗于演說時默聽之，此四聲者如連珠然，未嘗斷絕。又于西人演說場、劇場靜聽之，雖數千人不聞一聲。東洋汽車、電車必設唾壺，唾者狼藉不絕；美國車中設唾壺者甚希，即有亦幾不用。東洋汽車途間在兩三點鐘以上者，車中人假寐過半；美國車中雖行終日，從無一人作隱几臥。東西人種之強弱優劣可見。<sup>45</sup>

舊金山凡街之兩旁人行處(中央行車)，不許吐唾，不許拋棄腐紙雜物等，犯者罰銀五元；紐約電車不許吐唾，犯者罰銀五百元，其貴潔如是，其厲行干涉不許自由也如是。而華人以如彼凌亂穢濁之國民，毋怪為彼等所厭。<sup>46</sup>

西人行路，身無不直者，頭無不昂者。吾中國則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相對之下，真自慚形穢。西人行路，腳步無不急者，一望而知為滿市皆有業之民也，若不勝其繁忙者然。中國人則雅步雍

---

這和梁啟超在上引「新民說」中，以論斷的口吻大力著墨強調當下的中國已成為四萬萬病夫所造成的病國的論述相較，可以說是不同意涵和關注取向的兩種論述。唐才常在其中有關戒纏足的論述中，曾引用張氏上述之論以佐證其論點，有趣的是，在唐的引文中，張氏的說法變成「幾何不馴致家家為病夫，人人為侏儒，盡受殊方異族之蹂躪魚肉而不能與校也。」見湖南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編，《唐才常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頁146。唐氏將「家家」和「人人」錯置的引用，或許可以看出張氏有關「人人為病夫」的說法，僅具有一種警告譬喻的效用，而大不同於梁啟超對於四萬萬人皆已成病夫的明確論斷中，所含有的強烈當下國族和國家之生存危機意識。

<sup>45</sup> 梁啟超，〈新大陸游記〉，收入於《梁啟超文選》，頁403。

<sup>46</sup> 梁啟超，〈新大陸游記〉，收入於《梁啟超文選》，頁404。

容，鳴琚佩玉，真乃可厭。在街上遠望數十丈外有中國人迎面來者，即能辨認之，不徒以其軀之短而顏之黃也。

西人數人同行者如雁群，中國人數人同行者如散鴨。<sup>47</sup>

如果說，〈新民說〉裡所描繪的「四萬萬病夫」是梁氏對中國人體質的大特寫，在上述的對照描述中，梁氏將這種「病態的中國人」和他所見的「強國強種」之「他者」並列，無乃是更進一步的強化其對中國人病弱的身形和劣質的生活型態的批判手法，西方人扮演著他所關懷的「人種之優劣」課題的理想型，來對照他所批判之中國人所「體現」的「劣等民族」。

梁氏的《新民說》在當時中國思想界產生大了非常大的影響，引起廣泛的迴響。<sup>48</sup>其中有關以「病夫」比喻國人體質病弱的講法，顯然也在公共輿論界發酵。其中最有趣的例子，應是在1905年，後來大受歡迎的暢銷小說《孽海花》出版時，作者即以「東亞病夫」為筆名發表。《孽海花》原為金松岑(金一)所開頭寫作，後由曾樸接手改寫成長篇小說。曾樸本身曾和維新派人士交往，支持改革，也醉心於法國文學，在1905年時與友人在上海創「小說林出版社」，提倡譯作和創作小說。最早先在《孽海花》的出書廣告時，曾樸所用的筆名是「病夫國之病夫」，後來在正式出版時，改為「東亞病夫」並終其生未曾改變。<sup>49</sup>從其筆名之變更的模式，和曾氏本人對當時思想文化界動向之熟悉的情況研判，曾樸的筆名應是受到《新民說》的「病夫」論影響；然而曾樸不久前才從一場長達3年的重病(從1900年到1903年)中漸漸復原，這一項個人的生命經歷應也可能是其視自己為「病夫」的因素。反諷的

<sup>47</sup> 梁啟超，〈新大陸游記〉，收入於《梁啟超文選》，頁404。

<sup>48</sup> 有關〈新民說〉在20世紀初期的廣泛影響，見黃克武，《一個被放棄的選擇：梁啟超調適思想之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頁52-60。

<sup>49</sup> 有關其筆名之變更，見魏如晦，〈孽海花雜話〉，附錄於《孽海花·魯男子》(台北：桂冠，1984)，頁457-462。為何筆名有如此改變並沒有確切說明，但1905年「小說林出版社」新買了自己的印刷廠，印刷廠之名即為「東亞印書館」，「東亞」二字之靈感或許源自於此。至於為何用筆名發表，因為其內容或有影射先輩和友人之軼事，曾之岳父因而阻其出版；再者，書中內容有反滿和革命思想，在這兩樣因素作用下，曾樸因而用筆名發表以免張揚。見李培德，《曾孟樸的文學旅程》(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7)，頁93-94。

是，隨著《孽海花》的暢銷，一、二年間再版多次，逾5萬部，「東亞病夫」名噪一時，儘管當時大眾並不知曉曾樸實為原作者。所以，在二十世紀初期中國思想文化界中，「病夫」不僅得到了新的意涵，它還有一活生生的「代言人」——「東亞病夫」。而「東亞病夫」一詞也自此明確地進入了中國公共輿論圈，成為日後百年來幾乎無人不曉之詞。只是有多少現代人在誓言摘下所謂「西方人強加在中國人身上的帽子」時，能夠想像在常熟的曾氏墓園的江南園林勝景中，樹立了一「東亞病夫曾公孟樸之墓」的石碑呢？<sup>50</sup>

梁氏對於國民體格和中國國運密切關連的論述，和其對於「病夫」一詞的擴大解釋，也反映在大公報1906年的一篇評論中。在這一以「京師大學堂運動會記」為題的文章中，作者認為外國人之所以罵中國「為老大、為病夫」並非無的放矢，因為作者認為四萬萬同胞中舉凡纏足、吸鴉片、好花天酒地、好清靜無為者等均是「老大、病夫」者，而以所剩無多之「不老大、不病夫」之中國人，是不可能締造一強大國家：「嗚呼，以一千六百餘萬人自供給之外，而復供給三萬萬八千二百餘萬人(老大、病夫者)，國烏得而強！欲人(外國人)不老大我、不病夫我，可乎？」<sup>51</sup>文中作者除了表達了和梁啟超對於中國之人為病夫的相同見解，也認為中國之所以成為外人所罵的「病夫」正是其國民體格疲弱的結果，而唯有加強國民「體育」才可以免於繼續淪為「老大病夫」之困境。同樣地，「病夫」一詞在此文中，所指涉的對象包括國家和國民二者。

雖然梁啟超所標舉的尚武精神和其所宣揚的軍國民教育方式，在二十世紀初期的思想文化界引起各種贊同和反對的意見，但是梁氏將四萬萬同胞的身體「問題化」(problematize)的論述，無疑是當時思想界的主流取向。換言之，即使是不贊同以軍事化方式來鍛鍊國民的身體者，也均同意當時的中國人的身體，以「病夫」之軀來形容並不為過，因而必須有一套合適的方式加

<sup>50</sup> 見沈潛，〈半世風流孽海花——近代文學家曾樸傳略〉，《傳記文學》，第84卷第1期(2004)，頁111。

<sup>51</sup> 《大公報》，1905年5月6日，頁3。



以改良。比方說，著名的民初體操師資培訓者徐一冰，雖然強烈反對以尚武為宗旨的軍事體操教育，但是在 1908 年上海成立中國近代最早的體操專門學校時，明確地以「增強中華民族體質，洗刷東亞病夫恥辱」作為學校校訓。<sup>52</sup>可見當時以「東亞病夫」為針對中華民族體質而發的羞辱之語，已成為時人的理解。同樣地，強烈反對以舊武術和軍事體操作為青年體育的陳獨秀，也在 1916 年和梁氏提出類似的「體檢報告書」，他說：

盈千累萬之青年中，求得一面體壯，若歐美青年之威武陵人者，竟若鳳毛麟角。人字吾為東方病夫國，而吾人之少年青年，幾無一不在病夫之列，如此民族，將何以圖存？<sup>53</sup>

陳獨秀雖然沒有如梁啟超般地以「四萬萬同胞」為前提來加以評論，可是二者將個人乃至群體的身體強弱和民族的生死存亡視為因果關係的想法是一致的。此外，陳氏也和梁啟超一樣，將西方人作為身體的理想典範，來強化中國人「幾無一不在病夫之列」的強烈對比。陳獨秀的另一段話，把西方人的體態作為理想典範，並強烈鄙視中國人的身形的看法，發揮更是淋漓盡致：

譚嗣同有言曰：「觀中國人之體貌，亦有劫象焉。試以擬之西人，則見其萎靡，見其猥鄙，見其粗俗，見其野悍，或瘠而黃，或肥而弛，或萎而偻，其光明秀偉有威儀者，千萬不得一二！」這是什麼緣故呢？就是中國教育大部分重在後腦的記憶，小部分重在前腦的思索，訓練全身的教育，從來不大講究。所以未受教育的人，身體還壯實一點，惟有那班書酸子，一天只知道咿咿唔唔搖頭擺腦的讀書，走到人前，痴痴呆呆的歪著頭，拱著背，勾著腰，斜著肩膀，面孔又黃又瘦，耳目手腳，無一件靈動中用。這種人雖有手腳耳目，卻和那跛聾盲啞殘廢無用的人，好得多少呢？西洋教育，全身皆有訓練，不單獨注重腦部。既有體操發展全身的力量，又有圖畫和各種遊戲，練習耳目手

<sup>52</sup> 詳見徐元民，《中國近代知識份子對體育思想之傳播》（台北：師大書苑，1999），頁99-121；高翠，《從“東亞病夫”到體育強國》，頁9。

<sup>53</sup> 見陳獨秀，《新青年》，收入《獨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頁43。

腳的活動能力。所以他們無論男女老幼，做起事來，走起路來，莫不精神奪人，儀表堂堂。教他們眼裏如何能看得起我們可厭的中國人呢？<sup>54</sup>

文中所現呈現的中西體貌的強烈對比，和前引的梁啟超的〈新大陸游記〉的描繪，可謂是有異曲同工之趣；其中更是毫不保留地表達出，他認為中國人在西洋人面前，應覺自慚形穢的強烈自我批評之情。

針對本文的主旨而言，陳氏把中國被視為「東方病夫國」和個人身體列為「病夫之列」的敘事手法，也再度證驗了「病夫」涵意的擴大解解，可以說已深入人心了。無怪乎，在 1918 年成書的有關中國體育史研究的先鋒之作——郭希汾之《中國體育史》的序言中，為之作序的朱亮開宗明義即言：

一國之盛衰強弱、恆以國民之精神體魄為衡。我國右文左武，相沿千載，積弱既形，遂稱東方病夫之國。喧騰寰區，恥孰甚焉！近十年來，國民迷夢漸覺，始省重文之習，不足為治，於是結社設會，研究體育。<sup>55</sup>

從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從「中國是東方病夫」轉而為「中國是東方病夫之國」的歷史演化過程——一項源自西方政論比喻性的說法，卻在近代中國的公共論域中，因為中國境內思想價值的變遷，其意涵被「創造轉化」而成為了百年來，近代中國有關民族特質的公共論述和共同想像中的重要因素。事實上，在近代中國民族想像建構的過程中，這種歷史符號在新的論述脈絡中，取得新的意涵而發揮凝聚人心的作用，上述的「病夫」轉化並非是獨特唯一的現象。最典型的例子，莫過於「黃帝」從以往代表歷代「皇統」共同始祖的歷史符號，在經過晚清以降民族主義論述的重新打造後，轉而成為所謂中華民族共同始祖，使得個別的「中國人」透過此新認同，產生「血脈相連、休戚與共」的集體意識。<sup>56</sup>從這一個角度而言，不同於「黃帝」符號所代表的正面認同角色，「病夫」說可謂是集體共同缺陷，甚至是共同「原

<sup>54</sup> 此文發表於1917年，見陳獨秀，〈近代西洋教育〉，《獨秀文存》，頁109-110。

<sup>55</sup> 郭希汾，〈序〉，《中國體育史》（台北：商務，1967），頁1。

<sup>56</sup> 關於此現象的詳細的分析，見沈松僑，〈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28期（1997.12），頁1-77。

罪」(套用先前美國學者的說法)的想像。要如何克服，最終擺脫此一集體「原罪」，乃成為近百年來中國民族想像論述中的顯要的議題。

因此，不論是梁啟超或是陳獨秀對於中國人身體的「病態」描繪，都可以說是一種激發改革和正當化改革的必要性的論述策略，這種「醜化」所要改革對象的論述在近代中國追求現代化的歷程中，可謂屢見不鮮。最著名的例子莫過於魯迅筆下的阿Q，或是柏楊的「醜陋的中國人」，或是蔣介石在推行「新生活運動」時，把當時中國人的生活品質直斥為「野蠻」、「和牛馬豬羊一般」的說法。<sup>57</sup>可是如果我們再深入分析，我們將會發現，如果將「東亞病夫」和阿Q或是「醜陋的中國人」相比較，雖然後二者「面目可憎」的程度，應遠超過於前者，可是「東亞病夫」卻似乎在近代中國人的集體認同中佔有顯著的地位，而且在往後的演變下，「受辱意識」的強調如滾雪球似地，成為「東亞病夫」所挑弄的情緒。為什麼會如此呢？

無疑地，像前述梁啟超、陳獨秀等會以「逆耳忠言」角度的來思考「病夫」說(無論它是被理解為針對個人身體或民族抑或國家國力的形容和批評)，以作為改革依據的自省心態，或者像曾樸一樣以近乎自嘲的方式用「東亞病夫」為筆名等態度，並不足以全然代表近代中國有關「病夫」的錯綜複雜情緒。面對這個源自西方的「病夫」、尤其是其後來被轉化為批評每個中國人身體的「變形」雙重身份，近代中國民族主義論述者並不是都能平心靜氣地看待它。在強調對「他者」的敵視，以強化我族意識的民族主義論述中(尤其此種敵視的合理化基礎是認為對方是無情的加害者，而我族則是無辜受害者)，「病夫」說被理解成為是高傲的「他者」對我族尊嚴的惡毒羞辱。從這樣的角度出發，「病夫」說有關中國或中國人的負面批評是否言之成理並不是重點，反倒是其源自西方的「西洋」本質本身成為論述所著力之處。在這樣的解釋操弄下，「病夫」說最大的功用在於激發我族的集體受辱意識。所以，也正因為如此，「產下」了「病夫」說的西方，雖然根據本文的分析，

<sup>57</sup> 有關蔣介石如何運用「醜化」的論述策略以正當化其國家機器管束工作，詳閱黃金麟，〈醜怪的裝扮：新生活運動的政略分析〉，《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30期(1998.6)，頁163-203。

對於它後來在中國的「成長變化」的歷程，可以說是局外人；但弔詭的是，西方並沒有在中國「病夫」論述中缺席，尤其是在強調這是莫大的羞辱的論述中，西方是不可能被允許缺席的。在進一步分析此課題前，我們得先理解一些強調「病夫」的羞辱性的論述。

陳天華在 1903 年所寫的著名〈警世鐘〉一文，提到了「病夫」之喻：

恥！恥！恥！你看堂堂中國，豈不是自古到於今，四夷小國所稱為天朝大國嗎？為什麼到於今，由頭等國降為第四等國呀？**外洋人不罵為東方病夫，就罵為野蠻賤種**，中國人到了外洋，連牛馬也比不上。<sup>58</sup>

在此處前後文的脈絡主要是談論中國人如何淪為外族的奴才，成為外人眼中的賤種，陳天華將「東方病夫」和「野蠻賤種」並列，以形容中國人的低下處境，可以說是將中國和中國人的命運完全混為一談，充分體現了前述社會達爾文主義保國保種的高度危機意識。<sup>59</sup>更重要的是，在這一篇充滿情緒性措詞和殺伐之氣的論述中，「東亞病夫」一詞並非是用來檢討反省中國國力和國民體質改造的警語，而是在「恥！恥！恥！」聳動人心的標題開頭下，定位它的性質（外國人罵中國或中國人的用語），並將它和其他不堪入耳的羞辱字眼（野蠻賤種）並列。這樣的手法不啻為典型的民族主義者操弄讀者的受辱情緒以激發其同仇敵愾之情的宣傳作法。

諷刺的是，陳天華在〈警世鐘〉一文中，痛斥清政府無心從事改革造成中國面臨亡國滅種的局面的講法，對照先前在《時務報》上刊載的外文評論〈中國實情〉，二者對於無能腐敗的清政府的看法是一致的，差別不過是外文評論在文章開場白以「東方病夫」形容清帝國的困境和其病根之深。更令人值得探討的是，陳天華在文章中多處抨擊中國人，其措詞之激烈甚過於上引「東亞病夫」的任何可能涵意。比方說，陳氏痛述歷史上中國人殺中國人（指漢人殺漢人）以求榮於外族的例子比比皆是，他總結這種自相殘殺的現象說：

<sup>58</sup> 見陳天華，〈警世鐘〉，收入於《中國哲學史資料選輯》，頁527。

<sup>59</sup> 必須說明的是，陳天華此處所界定的「中國人」是漢民族本位的立場，其排斥的對象包括滿族。

各國不要調一兵，折一矢，中國人可以自己殺盡。天呀！地呀！同胞呀！世間萬國，都沒有這樣的賤種！有了這樣的賤種，這種怎會不滅呢？不知我們中國人的心肝五臟是什麼做成的，為何這樣殘忍？唉！真好痛心呀！<sup>60</sup>

此外，陳天華也直斥中國人安於「作奴才」（和梁啟超同），並且在面對中國要被瓜分的危機時，「可憐中國人好像死人一般，分毫不知。」<sup>61</sup>像這些「賤種」、「奴才」、「死人」等赤裸裸的措詞，尤其是所謂「死人」的比喻，均顯示其嚴厲的自我批評均不亞於「病夫」之謂。換言之，儘管陳天華以「東亞病夫」為外侮來激發民族羞恥感，通篇而言，陳天華的「醜化」論述策略絕不亞於前述梁啟超或是陳獨秀。

然而將「東亞病夫」一詞界定為外人恥笑辱罵中國人的用語的想法，配合上前述把「病夫」比喻轉化為針對中國人體質羸弱的形容用法的流行，畢竟使得二十世紀初的中國公共輿論界，漸漸視「東亞病夫」為西方人針對當時中國人身體所掛在嘴邊的嘲諷之語。無論是徐一冰體操學校校訓的「洗刷東亞病夫恥辱」或是大公報上的社論，都顯示出「東亞病夫」這種「外侮」的新理解的流行。不管在政令宣導、教育檢討、或通俗討論，都處處可見類似的想法。一如強力贊同體育軍事化的留學德國的體育教育家程登科所言：「現在我國人民，體短瘦弱，已成普遍現象，至於堅毅果敢的民族性，早經喪失殆盡，我們要挽救這個狂瀾，實行我國『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古訓，打破西人的『東亞病夫』和日本的『劣種』的侮辱的稱呼。」<sup>62</sup>

同樣強調外國人以「東亞病夫」對中國和中國人的侮辱情形，蔣介石在訓勉青年幹部時也說：

現在一般暴力侵略者，所以敢于藐視我們中國，侵侮我們中國。最大

<sup>60</sup> 陳天華，〈警世鐘〉，收入於《中國哲學史資料選輯》，頁526。

<sup>61</sup> 陳天華，〈警世鐘〉，收入於《中國哲學史資料選輯》，頁522。

<sup>62</sup> 程登科，〈怎樣利用軍警權力輔助民眾體育使全民體育化〉，《體育季刊》第2期(1935.11)，收入於成都體育學院體育史研究所編著，《中國近代體育史資料》(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頁422。

的原因，就是看不起我們中國人的體格，更比不上他們。而我們一般同胞的體格，普遍的衰弱，實是民族最恥辱的表現！從今以後，我們要積極自強，要不為人家所輕視，首先就要注重體育，提倡體育，……如此，只要三十年工夫之後，我們民族的體格，就可逐漸恢復健強，**一洗東方病夫的恥辱！**<sup>63</sup>

而這種「外侮」性質的強調，在 1920 年代通俗流行小說「近代俠義英雄傳」更是發揮得淋漓盡致。文中小說作者借一前來天津賣藝的俄國大力士之口，以充滿挑釁的口吻向擂台下的中國觀眾宣稱：

鄙人在國內的時候，曾聽得人說，**中國是東方病夫國，全國的人，都和病夫一般，沒有注重體育的。**鄙人當時不甚相信，**嗣遊歷歐美各國，所聞大抵如此。**及到了中國，細察社會的情形，乃能證明鄙人前此所聞的，**確非虛假。**<sup>64</sup>

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小說家在此以渲染誇大的手法，透過一位西洋人(俄國大力士)，先是以見證者的身份，「報導」了在歐美各國，所謂「中國是東方病夫國和中國人都是病夫」的說法，已經成爲了巷議街談，無人不知的話題的現象。小說家的文筆操弄，使得原先不過是西方輿論界在十九世紀末針對清中國國力的一句形容詞，成爲歐美各國人士個個琅琅上口，用來鄙視中國，特別是中國人身體的嘲諷標籤。當然，這一位西洋大力士不僅是「見證者」的身份，在小說情節的安排下，他更是想像中數以萬計抽象的「高傲的西方人」的代言者，在中國的土地上，在廣大的中國人面前，肆無忌憚地公開以「病夫」這一邪惡的標籤來羞辱台下的觀眾。(當然，真正的效果是用來羞辱閱讀這本暢銷小說的廣大中國讀者)。在如此開場佈局下，作者再安排書中的英雄人物霍元甲以爲民族雪恥的語氣回應：

**他說中國是東方的病夫國，國人都和病夫一般，他是世界第一個大力**

<sup>63</sup> 蔣介石對三民主義青年團全國幹部工作會議訓詞，刊於 1941 年 9 月的《國民體育季刊》，轉引自成都體育學院體育史研究所編著，《中國近代體育史資料》，頁 421。

<sup>64</sup> 見向愷然(平江不肖生)，《近代俠義英雄傳》(台北：聯經出版社，1984)，頁 160。

士，卻怕我這個病夫國的病夫做什麼哩？煩足下去請他到這裡來罷。

**我霍元甲是病夫國的病夫**，在世界大力士中，一些兒沒有聲名的；也沒有研究過體育，也不曾受全國人推崇，請他不必害怕，我此來非得和他較量不可！<sup>65</sup>

這一來一往之間的對話，不正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百年來所謂英雄人物洗刷民族之恥「現代民族英雄事蹟」的腳本和縮影嗎？<sup>66</sup>當群眾們在觀賞李小龍在銀幕上奮力一擊，踢毆「東亞病夫」時，抑或聽聞新聞媒體興奮地以洗刷「東亞病夫」民族恥辱，來形容中國體育選手代表在國際比賽時的傑出表現時，大聲歡呼叫好、充滿洋溢「雪恥」的滿足之情的場景，成為屢見不鮮的現象，不過是證實了，「病夫」在原初的風貌——改革者口中用來自我批判和激勵「病國」的寫照比喻——已不再為人所熟悉了；代之而起的另一種符號操弄，尤其是在日益高漲的民族主義的推波助瀾下，使得「東亞病夫」成為所謂國恥和民族之恥的象徵，是「他者」的無情惡意嘲諷，簡言之，是一項邪惡的符號——在二十世紀初期被中國思想文化界「改頭換面」的「東亞病夫」，經由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哺育」，已是「長命百歲」，深植於近代中國人的集體認同意識了。

#### 四、Long Live the Sick Man?：百年來「東亞病夫」情結的省思

本文以追本溯源的方式，從釐清「東亞病夫」在不同的歷史脈絡中的不同意義，進而探討它在近代中國民族想像中所扮演的角色。我們可以確認 19 世紀末期的甲午戰爭，促成了「東方病夫」說在西方輿論界誕生。由於目睹當時清中國改革無效，內部問題重重，某些西方觀察家以西方慣用形容類似

<sup>65</sup> 向愷然(平江不肖生)，《近代俠義英雄傳》，頁168。

<sup>66</sup> 小說中描述俄國大力士在知道霍元甲的實力後，不敢接受挑戰而且即刻轉往日本，不敢在中國繼續說大話傷人。有關近代中國文化史上，武術英雄何以成為替民族雪恥的代表人物的分析，參閱我先前的著作，〈身體、國家與俠——淺論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身體觀和英雄崇拜〉，《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10卷第3期(2000)，頁87-106。

局面的鄂圖曼帝國(土耳其)的形容詞——病夫(Sick Man)，來形容表達他們所觀察的清中國當時的困境。當然，這樣的形容絕非恭維之詞，但它也不是惡意中傷或無的放矢的謾罵。從當時中國輿論界的正面反應，尤其是致力於變法維新者以「逆耳忠言」態度視之，也可以看出這項源自西方的清中國「體檢報告」，是和中國維新人士對當時國勢危急的意見是一致的；中國思想家也引用相同的比喻，來強調當時中國必須變革的迫切性和正當性。可是到了二十世紀初期，國民改造成為政治社會改革根本的新思潮，尤其是強國必先強種的思維，使得國民身體素質的檢討批評成為新的思想課題。在這樣新的思想脈絡下，「病夫」的意涵在中國的思想文化界內，被操弄轉化成是針對當時中國人病弱身軀的寫實形容，甚至成為中國作家的自我比喻；但是在另一方面，隨著民族主義意識的高漲，「病夫」論的「外來性質」也開始被強調。由於這些新的歷史因素影響下，「東亞病夫」產生的原始歷史背景和其單純意義，漸漸為人所遺忘。在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滋養哺育下，「東亞病夫」成為了百年來，中國人集體記憶中，代表著傲慢無情的西方人所一直掛在嘴邊，嘲笑中國和中國人的羞辱名詞。簡言之，這一在中國思想文化史上「成長轉化」的「病夫」，不啻是中國人所創造想像的「他者的詛咒」，轉而為中國人集體認同意識中的「原罪」，必須以身體技能所搏得的榮耀，不斷地證明其已被解咒，已被清洗。

為什麼「東亞病夫」會有如此大的魅力，讓近代中國民族主義者不斷地召喚它以激勵人心呢？要回答這一複雜的問題並不容易，本文將從兩個面象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首先，當近代中國民族主義漸漸高漲，「病夫」說的外來屬性成為關注的焦點後，它就被詮釋為是西方帝國主義對於中國壓迫的另一種呈現方式——優越意識的白種人用語言暴力羞辱中國人的歷史事實。當這樣的觀點成為中國人民面對「東亞病夫」時，所預先被灌輸的信念時，這四個字的符號所代表的意涵，就成為是西方人以作賤中國人身體、羞辱中國人尊嚴的方式，來進行西方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另一種壓迫。在這種預期的心態下，「東亞病夫」一詞和所謂上海租界公園的「華人與狗不得入內」



的告示牌，在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論述中的地位是類似的；他們的真實性或實際內涵是不容質疑或分析的，因為他們已變成如同華格納的樂劇中，提示著「窮凶極惡的壞蛋」出場的引導動機(Leitmotif)樂句，他們的功用已經被設定是為喚起觀眾們對於「壞蛋」的負面情緒：要牢記「東亞病夫」和「華人與狗不得入內」背後的黑手——西方帝國主義者。<sup>67</sup>

除了上述「東亞病夫」被定位為象徵西方帝國主義的語言暴力外，換另外一個角度而言，「東亞病夫」之所以在近代中國民族集體記憶中「屹立不搖」的原因，則應是它在中國民族主義的「受害者故事」(victimization narrative)為主旨的近代中國史的敘事脈絡中，<sup>68</sup>和其他的「角色」、「情節」安排的配合度可謂相當合宜。這種配合性尤其呈現在和有關鴉片在中國近代史的角色解釋上。雖然大部分有關「東亞病夫」的討論，都痛斥其為西方人對中國人的語言羞辱，可是也大都認同近代中國人體質病弱的說法；因而在解釋中國人何以病弱時，往往就把「鴉片毒害中國人身體」和所謂「東亞病夫」現象解釋為因果關係，進而產生如以下典型的論述：

中國人體質急轉直下，是西方列強為了打開中國的大門，罪惡地向中走私鴉片，並用武力強迫清政府簽訂喪權國不平等條約，從而使鴉片貿易合法化，導致了上至皇清國戚，高官顯貴，八旗綠營兵丁，下至庶民百姓，吸毒成癮，不能自拔，使國運陷入萬劫不拔的深淵，使國人的體質遭五藏俱毀而不見血的摧殘，自始蒙「東亞病夫」的屈辱稱呼。<sup>69</sup>

<sup>67</sup> 有關「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真實性，和其與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關係的討論，參閱石川禎浩，〈「華人與狗不得入內」告示牌問題考〉，收入於黃克武主編，《思想、政權與社會力量》(台北：中研院近史所，2002)，頁137-156；Robert A. Bickers, Jeffrey N. Wasserstrom, "Shanghai's 'Dogs and Chinese Not Admitted' Sign: Legend, History and Contemporary Symbol," *The China Quarterly*, 142 (1995), pp.444-466.

<sup>68</sup> 有關受害者故事主旨對中國近代史書寫的影響討論，參閱Peter Hays Gries, *China's New Nationalism: Pride Politics, and Diplomac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pp.43-53; Paul Cohen, "Remembering and Forgetting: National Humiliation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Twentieth-Century China* 27, no. 2(2002), pp.1-39.

<sup>69</sup> 前引高翠，《從「東亞病夫」到體育強國》，引文見頁9，其他細論和圖說見頁9-17。持類似

雖然梁啟超和嚴復等晚清思想家也認為鴉片有害身體健康，但是他們並沒有將鴉片盛行的主因歸咎於西方(參見上引註 42 中，梁啟超對鴉片和身體健康的看法)。但是類似上引民族主義論述的重點，則是很明確地強調鴉片貿易背後的「黑手」——西方帝國主義。換言之，鴉片和病弱的身體在這樣的歷史解釋脈絡中，均是曝露了西方暴力侵略的重要論證證據。<sup>70</sup>

在上述的民族主義歷史觀主導下，無論如何，西方是不可能在「東亞病夫」的論述中缺席的：如果近代中國人的身體沒有病弱，那麼「東亞病夫」證明為高傲的西方人「強加在中國人身上的帽子」，因此西方無疑是加害者(透過語言暴力)；反之，如果近代中國人的身體真的是病弱不堪，那也主要是西方人所造成的(透過鴉片的毒害)。更嚴重的是，在第二種情況下，西方人居然又以「東亞病夫」二度以語言傷害其所殘害的中國人的尊嚴，使得中國人成為雙重受害者，西方因而更是邪惡的雙重加害者。所以，西方在這項以「東亞病夫」為主題的中國近代史論述中，是不可能擺脫掉其作為加害者的角色，不僅因為它與「東亞病夫」之間已經被定型而牢不可破的詮釋關係，也因為「東亞病夫」已成為了所謂鴉片戰爭開啓的近代中國「受害者」敘事史詩中不可或缺的一員。

如果我們將上述的分析，和本文先前對於「病夫」說在晚清時期的面貌的分析作一對比的話，我們將會驚訝地發現：當「病夫」在十九世紀被引介

---

的論點眾多，例如傅娟，〈十九世紀中英鴉片貿易合法化探析〉，《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第23卷第2期(1996.04)，頁126-132；鄭志林，〈識“東亞病夫”〉，《浙江體育科學》，第21卷第2期(1999.04)，頁50-54。

<sup>70</sup> 近年來已有中西學者重新檢討吸食鴉片和所謂國民身體素質的確切關連。不同以往將鴉片消費者一律視為毒品的上癮者的看法，新近研究將鴉片視為藥品、商品、消費品的角色，以重估它在當時社會中真正所發揮的作用和社會文化影響，而不再先入為主地以反鴉片者的立場和成見，作為檢視鴉片在中國的歷史角色的研究起點。相關討論見，R. K. Newman, "Opium Smok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 A Reconsideration," *Modern Asia Studies* 29, no. 4(1995), pp.765-794; Lars P. Laamann, "Pain and Pleasure: Opium as Medicin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Twentieth-Century China* 28, no. 1(2002), pp.1-20；林滿紅，〈財經安穩與國民健康之間：晚清的土產鴉片論議(1833-190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社會經濟史組編，《財政與近代歷史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9)，頁501-551。

至清中國時，它並沒有引起軒然大波和太多的激烈情緒反映，它甚至被接納援引以激勵當時改革的決心；即使在它日後被引伸為是針對中國人身體素質而發的評語後，我們還是可以看到改革者應用它來針對中國的各項缺點以促成中國人反躬自省。可是隨著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到了晚近，「病夫」已不再是改革者的夥伴，它也不可能是作家文人可以用來自嘲的符號；<sup>71</sup>因為它已成為民族主義論述中，代表百年來民族受壓迫的屈辱象徵，它已成為民族主義者口中動員群眾、召喚民族恥辱的利器。百年來歷史的發展，居然使當年一位改革論述中的配角，轉而為「反對西方霸權」論述的要角，成為動員億萬中國人心敵視西方的象徵符號。「西方來的病夫」，在百年中國的思想文化環境下，演變成如此新面貌，恐怕是當年不經意創造它的西方政論家所始料未及的吧！

可是，也正是如今如此「耀眼」的「東亞病夫」，令許多不了解其歷史變化的當代中國人，全然喪失了認清百年前，它還是相當單純的面貌的能力。換言之，不少現代中國學者在解讀歷史資料文獻時，只要看到「東亞病夫」，尤其是外國人提及「東亞病夫」時，就「想當然耳」地認定原文作者是在以「東亞病夫」指涉辱罵中國人。試舉一例說明此種現象：著名的《萬國公報》總主編美國傳教士林樂知(1836-1907)，從 23 歲時自美來華傳教直至 1907 年在上海去世，總共在中國生活了 47 年。在華期間除傳教引介西學外，經常為文鼓吹中國變法革新。在新近出版的一本研究《萬國公報》和主其事的西方傳教士的著作中，作者王林在評論林樂知時，有以下的論斷：

(林樂知)說中國人是東亞病夫，(林樂知曰)“今之論世者，恆稱中國為亞東一大病夫，猶之昔稱突厥為歐東一大病夫，自余觀之，此語實無可辯駁者也”。《萬國公報》如此大肆污蔑中國人，其目的就是要說明中國人由於受儒教的束縛、禁錮、大本已失，人心已壞，只有改信基

<sup>71</sup> 在我撰寫此文期間(今年6月間)，一則網路新聞報導，在中國大陸的線上遊戲有一位玩家以「東亞病夫」為其ID，結果引發軒然大波和口誅筆伐，甚至有人認定該玩家為日本人故意來挑釁。不曉得《孽海花》的作者曾樸(東亞病夫)地下有知，對此現代「東亞病夫」現象會有何感想？有關新聞見，〈數萬玩家聲討“東亞病夫”辱華濁浪〉〈<http://blogchina.com/new/display/34774.html>〉(18 July, 2004)。

督教才能起死回生，轉危為安。<sup>72</sup>

從王林所引述林樂知的話「今之論世者，恆稱中國為亞東一大病夫……」就已經很明白地表達，林樂知是在轉述時人皆謂中國為亞東病夫的說法，而林樂知本人因目睹中國一再改革失敗，因而也不得不同意此評價。此處，林樂知僅是在表達它對當時中國改革的失望之情。<sup>73</sup>可是王林一開始就先入為主斷言「林樂知說中國人是東亞病夫」，又進一步認為林樂知「如此大肆污蔑中國人」。這樣先入為主的誤讀現象，事實上也正好證明了長期以來在民族主義史觀的影響，使得現代研究者如同已被pre-programmed，即使閱讀到的「東亞病夫」文獻資料只有單純的意涵，也會主動地將衍生意涵「讀入」其中，因而扭曲原作者之意。連一位將他人人生三分之二的旅程是在中國渡過，一生的黃金歲月都奉獻於中國改革事業的外國人，在「東亞病夫」的陰影下，都難逃如此嚴厲的批評，更何況是那些高度抽象化，而且往往是被想像成對中國懷有敵意的千千萬萬陌生的西方人呢？

最後，在回顧「東亞病夫」在近代中國演變的歷史，了解它的變遷意義和它在不同時期中所被賦與的角色後，我們要如何回應 Paul Cohen 對於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的呼籲呢？就本研究所探討的「東亞病夫」之議

<sup>72</sup> 詳見王林，《西學與變法——《萬國公報》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4），頁259。

<sup>73</sup> 林樂知全文，〈論中華時局〉刊於《萬國公報》，157冊，1902年2月，頁20737-20744。林樂知在文中言明自己在華居住四十餘年，深望中國能早日振興，因而以苦口婆心的口吻提出改革意見；文中雖有多項批評，但其懇切之情隨處可見。如今卻遭現代中國學者因誤解「東亞病夫」之意涵而幾乎全盤否定其用心，實是對其一生之努力相當大的反諷。相形之下，前引1906年的《大公報》評論，雖然依據本文的分析，也誤以為西方所謂的「病夫」論乃針對中國人體格而發，但是其中有一段發人深省之語：「嗚呼！東西各國罵吾國為老大，為病夫。吾聞其言，初而怒，繼而痛，終而感。何怒乎？怒其言無禮也；何痛乎？物必先腐而後蟲生；我不老大，誰得而老大之？我不病夫，誰得而病夫之？外人既老大我矣、病夫我矣，必我先自居於老大，自居於病夫無疑。何感乎？外人既口直心快，而老大我矣、病夫我矣。我聞之，宜如何自悔，宜如何自勵，宜如何去其老大而少年之，去其病夫而壯夫之。假使外人，內以我為老大為病夫，而外反誣我曰：『子少年、子壯夫。』而我聞之亦毫不解悟，欣欣然自得曰：『我少年、我壯夫。』嗚呼，是終老大矣，是終病矣，是終不可救藥矣！吾聞其言，吾安得不怒？安得不痛？更安得不感？」《大公報》，1906年5月6日，頁2-3。兩相對比，百年以前的評論對於「病夫」論所流露的反躬自省之情，對於現今網路上，沸沸揚揚的「洗刷民族之恥」的聲浪激情，亦有足以發人深省之處。

題而言，當西方已被定位為一項百年之恥的主謀者時，而此歷史解釋又早已由政治文化宣傳深入人心後，Cohen 所期待的，平心靜氣理性重估西方在中國史的適切位置的努力，究竟還有多少運作的空間呢？或者更明確的說，這樣的努力，還能夠對已深入人心，且充滿高度民族主義情緒的「神話式」的歷史記憶和解釋，還能發揮多少作用呢？對於上述的疑惑，或許 Cohen 有關近代中國對於義和團的詮釋傳統的研究，提供了我們思考此課題的一些線索。

在近代中國對於義和團的評價中，代表性的兩種極端詮釋的一方視義和團是落後迷信，愚昧自大的舊中國的代表，其所呈現的野蠻和莽動性質，是中國要追求現代化的歷程的一大夢魘；相對地，另一極端的詮釋則認為，義和團是中國人英勇對抗侵略者的愛國行為，它代表著被壓迫者的集體反抗意志展現，是對抗帝國主義的鬥爭史中的光榮事績。Cohen 認為從十九世紀以來，西方在中國的兩種極端對比形象和其所引發的矛盾情緒反應，和上述兩種對義和團極端詮釋是息息相關的：義和團所對抗的西方，一方面被尊崇為「天使」，是進步和現代文明的表率，是中國努力學習仿效的理想典範；另一方面，西方又是「魔鬼」的化身，是對中國無情侵略的帝國主義者，是毒害中國人的元兇，是阻礙中國成為有尊嚴有自主權的國家的最大迫害者。<sup>74</sup>當然在現實中，這兩種對西方的態度並非是涇渭分明式地存在，而是在中國人認同的建構過程中形成兩大張力，在每個人的心中形塑其對自我認同和理解他者的複雜情緒。

「東亞病夫」在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的不同面貌，事實上也反映出了上述中國人對於西方這個「他者」的兩種形象的矛盾複雜情緒：從視西方為效法學習的改革者角度看來，不論是「病夫」的原意或是其在中國所轉化的新意涵，都是代表在「進步」和「文明」的西方標準的衡量下，對中國或中國人實際情況的「診斷」，因此唯有勇於面對於這樣的現實並積極改革，才能早

---

<sup>74</sup> Paul A. Cohen, *History in Three Keys: The Boxers as Event, Experience, and Myth*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287-288.

日擺除「病體」、躋身強國之林，和西方人同樣地擁有「天使般的身形」。相對地，對視西方是「魔鬼」的化身的激進民族主義者而言，「東亞病夫」是惡毒或是不實的指控，是西方帝國主義語言暴力的具體呈現。「東亞病夫」見證了西方帝國主義者邪惡的本質，配合著鴉片輸入，它是西方對於中國物質和精神上雙重壓迫的最佳代表。<sup>75</sup>在這樣的歷史意義定位下，這個「魔鬼的詛咒」，就如同鄧小平所言，自然是青年歷史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員。從「東亞病夫」在近代中國歷史的演變看來，後者儼然已成了主導的看法。職是之故，在近代中國史還是維持「受害者故事」為其基調的前提，再加上 2008 北京奧運即將到來的情況下，承受了沉重的歷史包袱的「東亞病夫」，雖然已是「一百多歲」垂垂老矣，恐怕還是未能「壽終正寢」，退出歷史舞台。<sup>76</sup>誠然，從理性思想分析的角度而言，「東亞病夫」在近代中國「生根、成長、轉化」的過程中，充斥著太多認知上的謬誤和不必要的情緒操弄；但也正因為如此，它百年來的歷史動向不啻是近代中國人，在自我言詮和認識世界的過程中，對於西方和西方人愛憎交雜的矛盾心情的具體呈現的一頁滄桑史。

<sup>75</sup> 有趣的是，正如前述所言，在現實中，對西方的兩種態度是交互作用影響的。即使是以強烈民族主義為主導的思維，也大都鼓吹要在國際運動競技場上用「天使般的身手」，來抗議「魔鬼的詛咒」。這不啻顯示出，西方現代運動所標榜的身體典範，和奧會金牌所激發的民族主義情緒，實際上構成現今洗刷「東亞病夫」之恥論述的重要因子。

<sup>76</sup> 如果對異文化的了解思維方式，依舊無法超越如 Edward Said 所批判的二元對立、本質主義 (essentialism) 式的化約模式，那麼對於「他者」的誤解還是會層出不窮。「東亞病夫」的曲折演變史的分析，正是顯現這樣的誤讀所導致的荒謬現象。

## 參考書目

### 一、史料

1. 《大公報》。
2. 《時務報》。
3. 《清議報》。
4. 《萬國公報》。
5. 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中國哲學史組編，《中國哲學史資料選輯——近代之部下》，北京：中華書局，1962。
6. 成都體育學院體育史研究所編著，《中國近代體育史資料》，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
7. 苑書義,孫華峰,李秉新主編，《張之洞全集》，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
8. 夏曉虹編，《梁啟超文選》，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
9. 梁啟超，《梁啟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10. 梁啟超，《飲冰室文集》，上海：中華書局，1941。
11. 陳獨秀，《獨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
12. 湖南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編，《唐才常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
13. 湯志鈞編，《康有為政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
14. “China and Japan,” *The Times*, 23 April 1895.

### 二、專書

1. 王樹槐，《外人與戊戌變法》，台北：中研院近史所集刊，1980。
2. 王林，《西學與變法——《萬國公報》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4。
3. 向愷然(平江不肖生)，《近代俠義英雄傳》，台北：聯經出版社，1984。
4. 李培德，《曾孟樸的文學旅程》，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7。
5. 高翠編著，《從“東亞病夫”到體育強國》，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
6. 徐元民，《中國近代知識份子對體育思想之傳播》，台北：師大書苑，1999。
7. 許義雄等著，《中國近代體育思想》，台北：啓英文化公司，1996。
8. 黃金麟，《歷史、身體、國家》，台北：聯經，2000。
9. 黃克武，《一個被放棄的選擇：梁啟超調適思想之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
10. 湯志鈞，《戊戌變法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
11. 楊英英編，《鄧小平文選》，第3卷，台北：地球出版社，1994。

12. Anderson, Benedict. *Imagined Communities*. New York: Verso, 1991.
13. Brownell, Susan. *Training the Body for China: Sports in the Moral Ord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14. Chirol, Valentine. *Far Eastern Question*. New York: Macmillan and Co., 1896.
15. Cohen, Paul A.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16. Cohen, Paul A. *History in Three Keys: The Boxers as Event, Experience, and Myth*.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17. Gries, Peter Hays. *China's New Nationalism: Pride Politics, and Diplomac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18. Ooms, Herman. *Tokugawa Ideolog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19. Pye, Lucian W. *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20. Said, Edward W. *Orientalism*. London: Vintage Books, 1994.

### 三、相關文章

1. 石川禎浩，〈「華人與狗不得入內」告示牌問題考〉，收入於黃克武主編，《思想、政權與社會力量》(台北：中研院近史所，2002)，頁137-156。
2. 沈潛，〈半世風流茱萸花——近代文學家曾樸傳略〉，《傳記文學》，第84卷第1期(2004)，頁111。
3. 沈松僑，〈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28期(1997.12)，頁1-77。
4. 林滿紅，〈財經安穩與國民健康之間：晚清的土產鴉片論議(1833-190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社會經濟史組編，《財政與近代歷史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9)，頁501-551。
5. 郭希汾，〈序〉，《中國體育史》(台北：商務，1967)，頁1。
6. 張灝，〈晚清思想發展試論——幾個基本論點的提出與檢討〉，收入於周陽山、楊肅獻編，《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晚清思想》(台北：時報，1982)，頁19-33。
7. 黃金麟，〈醜怪的裝扮：新生活運動的政略分析〉，《台灣社會研究季刊》30期(1998.06)，頁163-203。
8. 程登科，〈怎樣利用軍警權力輔助民眾體育使全民體育化〉，《體育季》，第1卷第2期(1935.11)，收入於成都體育學院體育史研究所編著，《中國近代體育史資料》(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頁422。
9. 楊瑞松，〈身體、國家與俠——淺論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身體觀和英雄崇拜〉，《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10卷第3期(2000)，頁87-106。
10. 傅娟，〈十九世紀中英鴉片貿易合法化探析〉，《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第23卷第2期(1996.04)，頁126-132。
11. 葛兆光，〈1895年的中國：思想史上的象徵意義〉，收入於氏著，《中國思想史》，第2



- 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頁530-550。
12. 熊曉正、曹守詠、林登轅，〈20世紀中國人體育認知的軌迹〉，《體育文史》，第1期(1997)。
  13. 鄭志林，〈識“東亞病夫”〉，《浙江體育科學》，第21卷第2期(1999.04)，頁50-54。
  14. 魏如晦，〈孽海花雜話〉，附錄於《孽海花·魯男子》(台北：桂冠，1984)，頁457-462。
  15. Bickers, Robert A., Jeffrey N. Wasserstrom. "Shanghai's 'Dogs and Chinese Not Admitted' Sign: Legend, History and Contemporary Symbol," *The China Quarterly* 142 (1995), pp. 444-466.
  16. Cohen, Paul. "Remembering and Forgetting: National Humiliation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Twentieth-Century China* 27, no. 2(2002), pp. 1-39.
  17. Larissa N. Heinrich. "The Pathological Body: Science, Race, Literary Realism in China 1770-1930." Berkeley, California: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2002.
  18. Laamann, Lars P.. "Pain and Pleasure: Opium as Medicin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Twentieth-Century China* 28, no. 1(2002), pp. 1-20.
  19. Louie, Kam. "Chinese, Japanese and Global Masculine Identities," in Kam Louie and Morris Low, eds., *Asia Masculinities: The Meaning and Practice of Manhood in China and Japan* (London: RoutledgeCurzon, 2003).
  20. Newman, R. K.. "Opium Smok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 A Reconsideration," *Modern Asia Studies* 29, no. 4(1995), pp. 765-794.

#### 四、網頁

1. 〈<http://www.sinica.edu.tw/as/person/ytleee/37.html>〉 (18 July, 2004)
2. 〈<http://www.beijing-2008.org/51/81/article211618151.shtml>〉 (18 July, 2004)
3. 〈<http://www.wenweipo.com/special/WWP-50/china50/part2u.htm>〉 (18 July, 2004)
4. 〈<http://tyj.sh.gov.cn/dashiji.jsp>〉 (18 July, 2004)
5. 〈[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ies/commentary\\_text.php4?id=83&lang=1&m=contributor](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ies/commentary_text.php4?id=83&lang=1&m=contributor)〉 (18 July, 2004)
6. 〈<http://www.iht.com/articles/517763.html>〉 (18 July, 2004)
7. 〈[http://www.businessweek.com/magazine/content/02\\_50/b3812068.htm](http://www.businessweek.com/magazine/content/02_50/b3812068.htm)〉 (18 July, 2004)
8. 〈<http://observer.guardian.co.uk/comment/story/0,6903,1113142,00.html>〉 (18 July, 2004)
9. 〈[http://www.findarticles.com/p/articles/mi\\_m2751/is\\_73/ai\\_109220705](http://www.findarticles.com/p/articles/mi_m2751/is_73/ai_109220705)〉 (18 July, 2004)
10. 〈<http://www.freedomandprosperity.org/Articles/wsj10-14-02/wsj10-14-02.shtml>〉 (18 July, 2004)
11. 〈<http://blogchina.com/new/display/34774.html>〉 (18 July, 2004)

## Imaging National Humiliation: “Sick Man of East Asia” in the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History

Yang, Jui-su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term “Sick Man of East Asia” in the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history. As well known, “The West”, as the most significant “Other”, has figured prominently in the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 discourse. The idea of “Sick Man of East Asia” in particular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modern Chinese imagination of their national identity. It has long been regarded by many Chinese as an epithet ruthlessly imposed upon China by the Western imperialists to humiliate both China and the Chinese people, especially the poor physical quality of the Chinese people. However, this kind of understanding of this term is indeed ahistorical and full of distortions. As my research will point out, this term was initially utilized by the Western political discourse to describe the weak and corrupt condition of the Ch’ing Empire in the late 19<sup>th</sup> century. At the time, many reform-minded Chinese intellectuals agreed with this political “diagnosis” of the Ch’ing China and even frequently borrowed this term to stress the necessity of embracing radical reform programs. However, in the early 20<sup>th</sup> century, when many Chinese came to feel extremely anxious about the decline of physical prowess of the Chinese people, Chinese thinkers, such as Liang Ch’i-ch’ao, invested new meaning to the term “Sick Man of East Asia” ----meaning all the Chinese people are seriously sick and weak beings----in order to stress the importance of the national body reform movement. In other words, the meaning of term was

reinvented by the Chinese thinkers themselves to amplify the sense of national crisis in order to stimulate people's will to reform. Ironically, as time went on, the Chinese people came to regard this term as purely a contemptuous criticism on the Chinese body from the evil West, totally forgetting and ignoring the fact that the added meaning of this term is a historical product done by the Chinese thinkers in the early 20<sup>th</sup> context and has little to do with the West. The term has therefore been appropriated time and again to mobilize and provoke xenophobia sentiment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Chinese collective identity. In particular, Many Chinese enthusiastically believe that victory in international sports games is the best way to "wipe up" the national humiliation resulting from "Sick Man of East Asia." By showing the root of the "imagined" national humiliation and analyzing the dramatic trajectory of how "Sick Man of East Asia" has been manipulated by the modern Chinese nationalist discourse, this study reveals the complicated role that the West play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Chinese identity and the ambivalent feeling of the modern Chinese people toward the Western culture.

**Keywords: Sick Man of East Asia, National Humiliation, Collective Identity, Liang Ch'i-ch'ao, Body, Orientalism**